

## 如何做古代哲学：一个导论

(2022 草稿，欢迎批评指正)

程炜 [cheng.wei@pku.edu.cn](mailto:cheng.wei@pku.edu.cn)

希腊哲学，不仅从历史上看是希腊文化的最大成就之一，而且从效应上看常常被视为当代哲学，甚至一切科学的直接起源。甚至按照 Bernard Williams 的说法，整个西方哲学就是希腊文化最伟大的遗产，它开启了哲学探讨的绝大多数领域和大部分核心问题：

希腊留给西方哲学的遗产就是西方哲学本身。这里，事情并不仅仅像在科学中那样，希腊人开辟了某些路径，而在这些路径上的现代发展却将他们的成就远远抛在了后头；也不只是像在艺术中那样，希腊人创造某些形式和具有这些形式的一些作品，而后继的时代在回顾时或多或少地把它们视为成就的典范。在哲学中，希腊人开创了几乎所有的主要领域——形而上学、逻辑学、语言哲学、知识论、伦理学、政治哲学和艺术哲学（尽管是在一个非常有限的程度上）。他们不仅开辟了这些研究领域，而且逐步区分出这些领域中许多恒久公认的最基本问题（《希腊的遗产》中译本，页 225）。

尽管这一传统的叙事或许有些夸大其词，但古希腊哲学重大的历史效应是完全毋庸置疑的。而鉴于这一主题的复杂性与巨大意义，本文无法也无意于提供一个关于它全面的发展图景（市面上此类书籍的不断涌现甚至已经超出一般读者的需求），而是结合近年研究进展，为有兴趣进一步研读的读者和学生提供一个实用的指南，为学术进阶提供初步的帮助。从这一主旨出发，这份指南更多用力于提出问题，而非给出现成的解答；更用力于提供文献、方法和操作上的帮助，而非阐释具体的哲学家、哲学概念或论证，无论是在历史的还是系统的意义上。除了正文提及的大量文献，本文的脚注也会尽量为相关主题提供文献上的指引、评论或补充。但由于本文的导论性质，这里提及的文献，除了具体论证的需要之外，仅限于笔者眼中相对重要的或易于寻得的书刊，并不追求系统完备<sup>1</sup>。

### 1. 整体特征

我们称之为古希腊哲学的领域，在欧美传统上直接称之为『古典哲学』（classical philosophy）或者『古代哲学』（ancient philosophy）<sup>2</sup>。根据一般的历史分期学，这一哲学传统始于公元

---

1 出于同样的理由，本文推荐的文献会以英文著作/翻译为主，在可能的情况下会附带中译本信息。其他研究用语种——如法德意等——只做最小限度的引用，因为它们大多数情况下更适合于进阶者，同时国内相对不易获得。

2 为了行文简化，本文将主要讨论的对象称之为『古代哲学』，尽管更为准确的表达或许是『古希腊罗马哲学』或『西方古代哲学』。这里没有讨论其他领域，例如『中国古代哲学』或者『印度古代哲学』，纯粹出于论域的限制，既然本文是作为《西方古典学论纲》的一个章节来写作。这里的简称并不代表对于整体的『古代哲学』概念有任何希腊或者欧洲中心主义的预设。不过，需要注意，本文回避使用『古典哲学』这一称呼，这部分是为了避免涉及『经典』或『经典主义』的种种联想与争议。文本所涉及的部分专业术语会给出原文或者现代西文的表达，以便读者查阅。

前 6 世纪小亚细亚沿海的希腊城邦，在经历其在雅典的繁荣和希腊化时期的拓展，最后与罗马时期的思潮结合与转化，并且终结或者消融于兴起的基督教世界。由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这段哲学历程中的特殊位置，我们一般将他们及其同辈所代表的哲学称为『经典时期哲学』；与之相应，之前的哲学称之为『前苏格拉底哲学』(Presocratic philosophy) 或『早期希腊哲学』(early Greek philosophy)<sup>3</sup>。而从亚里士多德去世后一直到公元前 1 世纪罗马共和国覆灭期间的思潮，通常称为『希腊化时期哲学』(Hellenistic Philosophy)；这一时期除了延续的学园派(Academics, 柏拉图派)和漫步派(Peripatetics, 亚里士多德派)之外，伊壁鸠鲁主义(Epicureanism)、斯多亚学主义(Stoicism)和怀疑论(Skepticism)走上哲学舞台并且成为更具时代特色的思潮<sup>4</sup>。而在随后的罗马帝国时期，这些学派分别得到了发展并且彼此相互交融，直到公元前 2 世纪末到 3 世纪出现了以普罗丁(Plotinus)为奠基人的新柏拉图主义(Neoplatonism)。这一时期伴随着教学活动而兴起的哲学注释，成为同时代哲学活动和交流的一个重要特征，其对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经典化具有重要影响。而随着基督教的兴起和罗马帝国的分裂，柏拉图主义逐渐融入基督教的主流学说，而这一转变也一般被视为古代哲学的终结(参附录：年代简表)。<sup>5</sup>

尽管古代哲学的历史重要性本身毋庸置疑，但它在什么意义上是经典的并且在什么意义上影响着甚至构成着我们今天的哲学，却并不容易理解。这不仅因为哲学概念本身——其来源于对古希腊语 *philosophia* 的翻译——在今天就争议重重，而且——这一点一些当代学者未能注意——这一概念在古希腊也并非自明，而是在不同时期在不同的哲学家或者学派那里有着不同的理解。换句话说，对于什么是哲学的争论伴随着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并且一直到今天并未终止。尽管这一特征增加了理解古希腊哲学的难度，但它并不是一件坏事。相反它促使我们不去接受任何现成的答案，而是尊重和关注这一学科的复杂性，这本身就是学术研究或哲学探究的本意之一。

为了说明这一复杂性，我们有必要从构词上简单考察一下『哲学』(*philosophia*)这一概念。众所周知，它来自『爱』(*philo-*)与『智慧』(*sophia*)；从概念上就足以看出，它

3 『早期希腊哲学』的流行是由于学者对前一名称的种种不满导致。不仅因为『前苏格拉底』这一标签蕴含了某种哲学发展的目的论，或多或少将相关哲学论述作为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的准备，却忽视了它们自身的或者内在的价值，而且其中涉及的一些思想家实则是苏格拉底的同时代人，并非先人(参文章后所附年代简表)。一个新近关于『前苏格拉底哲学』概念和历史编纂学的考察，参 André Laks, *The Concept of Presocratic Philosophy: Its Origin, Development, and Significance*. Translated by Glenn W. Mos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4 怀疑论更应该视为一个思潮，而不是严格的学派。值得一提的是，就柏拉图学园的发展而言，Arcesilaus 于公元前 266 开启了一个怀疑论时期，这一思潮统治了所谓的『中期学园』并持续到所谓『新学园』早期(以 Carneades 执掌学园为开端)。一般认为，Ascalon 的 Antiochus (公元前 125-68 左右)将学园重新拉回反怀疑论的轨道。

5 需要注意，上述对于的哲学史分期无疑受到历史分期的影响，但并不完全对应。例如，一些从历史分期上看应该属于经典时期的哲学家(比如 Melissus 或者 Protagoras)，按照哲学史通常被归入早期希腊哲学，而早期学园的部分时期从历史学的角度其实已经跨入希腊化时期。总而言之，这里对于古代哲学的年代学界界定只是为了论述方便，它们的上限、下限与分期自然都包含争议。例如，马仁邦(John Marenbon)对于漫长的中世纪哲学论述就包括对于后古典时期希腊和罗马哲学分期的批评和修订，参其著《中世纪哲学》，吴天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首先并非一门专业学科，而更多在于表达是一种态度甚至一种活动，即对于智慧的爱。然而，由于对于『爱』和『智慧』的不同理解，也导致这一概念——作为两者的结合——在古代就引发了争议。就前者而言，我们可以区分出有限主义和无限主义两种趋向，前者认为『爱』作为一种亲近关系，强调了认知主体与对象的亲熟，那么在这一意义上，*philo-sophia* 就是成为智慧之友，因此他也是智慧者 (*sophos*) 或者是智慧者的候选人。与之相对，无限主义则将『爱』视为『欲求』『追求』，在这一意义上『爱智者』就与『智慧者』有着不可逾越的横沟，追求本身甚至某种无知则成为哲学活动的核心特征。如果说这一分歧造成了对于哲学属性的不同认识，那么对于 *sophia* 的不同理解则导向了**实质内容**的差异。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sophia*，正如其来源 *sophos*，首先实则指向某种实用技能，尤其是手工技艺或者诗艺，而这一原初面相在古典时期就受到挑战<sup>6</sup>。一方面，*Isocrates* 以及他的追随者将其与实践、政治和修辞技艺相系；另一方面，作为他的竞争者，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均从不同的角度反驳了这一实用/政治化的 *philosophia* 理解，而走向更多引向以理论旨趣为主导的探究<sup>7</sup>。不过有趣的是，即使局限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一更为主流的传统，*sophia* 的内涵也在知识（解释和论证性的理论）、洞察（直观认识）与行动（善好生活）之间游动，成为当时与后世争论的重要源泉之一，这些都足以展现古希腊哲学本身的多元性和复杂性。

当然，我们对于古希腊哲学的理解，不仅受到他们对于 *philosophia* 概念本身的把握，也受到当下的哲学概念和哲学史书写传统的双重影响，后者远比 *philosophia* 这一概念的转化甚至更为复杂。无论 *philosophia* 起源于毕达哥拉斯派还是柏拉图<sup>8</sup>，流行的哲学史论述往往将古希腊哲学的起点追溯到更早的泰勒斯 (*Thales*)，但这一泰勒斯在什么意义上可以作为哲学的起点，甚至他的基本观点——万物起源于水——到底在什么意义上开启了哲学传统实则晦涩不清。他与哲学的联系毋宁说更多来源于亚里士多德自身对于哲学传统的追溯，而近年来关于亚里士多德及其学派对于『学史传统』 (*doxographical tradition*) 的叙述都一再说明近代以来的哲学史观念受到这一古代传统的强烈影响，这也使得古代哲学的研究者有必要批判性的考察这一论述的思路<sup>9</sup>。不少哲学史写作的修正主义者将哲学的起源设定为更晚的巴门尼德或者反过来更早的 *Hesiod* 并非偶然，他们可以视为从不同的角度对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哲学史的反驳。当然，我们在此无意于去探究或者考察何种历史论述更具有合

<sup>6</sup> 对于 *philosophia* 及其相关概念的早期发展概览，参 *Brill New Pauly* 的词条“Philosophy”或 *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 词条“Philosophie (Abschnitt I: Antike)”。

<sup>7</sup> 关于柏拉图与 *Isocrates* 在哲学理解和教育上的竞争，参 *Kl. Ries, Isocrates und Platon im Ringen um Die Philosophia* (München, 1959). *James Henderson Collins, Exhortations to Philosophy: The Protreptics of Plato, Isocrates, and Aristotle*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 2015)。

<sup>8</sup> 关于这一争议，参两篇持对立观点的代表性论文：Walter Burkert, “Platon oder Pythagoras? Zum Ursprung des Wortes ‘Philosophie,’” *Hermes* 88, no. 2 (1960): 159–77. Christoph Riedweg, “Zum Ursprung des Wortes ‘Philosophie’ oder Pythagoras von Samos als Wortschöpfer”, in: A. Bierl/A. Schmitt/A. Willi (Hg.), *Antike Literatur in neuer Deutung Festschrift für J. Latacz*, München 2004, 147–181。

<sup>9</sup> 关于这一研究路径，参 *Jaap Mansfeld, “Doxography of Ancient Philosophy”* (SEP, 2016 版), <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doxography-ancient/>。

理性。这里我们毋宁更希望强调的是,古代哲学的研究者有必要对各种历史叙述及其背后的理论预设保持敏感,其目的不仅在于考古的兴趣,而且也包含了对于哲学概念本身的反思。

事实上,由于古代哲学涉及论题的广泛性以及概念的含混,要在理论上刻画其核心特征十分困难。Bernard Williams 认为希腊人不仅规定了当今哲学的主题与核心问题,只有观念论(idealism,这里定义为除了心灵之外无物存在)和历史意识(思想意识被社会历史的物质和思维条件所决定)是希腊哲学不曾有的两个特征(参《哲学》,载于《希腊的遗产》中文版,第223-4页)。这一刻画尽管不乏支持者,但也有反对者认为就前者而言,我们能够找到希腊哲学的对应物<sup>10</sup>;而缺乏历史意识似乎不是希腊哲学的某种独特性,而是主流哲学的特征:它倾向于关注思维和概念本身的关联;与之相对,恰恰只有思想史或者社会史家才尤其关注社会历史条件对于思想的决定和影响(尽管这不乏争议),不过这一维度的缺乏并不意味着希腊哲学或思想整个历史维度或者历史意识的缺乏<sup>11</sup>。尽管对于古代哲学任何的普遍性刻画都是危险,这里我仍旧试图给出部分核心的并且可能吸引当代读者的特征:

1. 高度的反思性:这一维度引向了对于某种规范性的自我知识的关注,不同于近代哲学习惯于将自我知识作为认知主体对于他人不可通达的当下自我心灵状态的确认,希腊的自我知识更为客观与开放,它往往与道德知识、自我关怀和自我塑造紧密结合。这一意义的自我知识,不仅是认知的必要条件,甚至成为其他类型知识的典范<sup>12</sup>。
2. 高度的对话性:不仅对话文体在古代哲学家那里流行,并且他们往往利用一切媒介或者文类,参与到哲学论辩中。这意味着哲学交流大量发生在广场、运动场、教室和剧院,在私人交谈、公共论辩,甚至戏剧表演中;论文、对话、书信、课程笔记都是重要的哲学交流媒介<sup>13</sup>。
3. 注重给出理由:“logon didonai”(“给出论证”)不仅是柏拉图对话中苏格拉底一再的坚持,也是几乎大部分古希腊哲学家的共同理念,甚至并不把理性论辩视为最高价值的学

<sup>10</sup> 围绕前一个特征, Burnyeat 为 Williams 的立场提供了详细论证,而 Fine 和 Gabriel 都表示了异议,参 Myles F. Burnyeat, “Idealism and Greek Philosophy. What Descartes Saw and Berkeley Missed,”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XCI (1982): 3–40. Gail Fine, “Sextus and External World Scepticism,” *Oxford Studies in Ancient Philosophy* 24 (2003): 341–85. Markus Gabriel, *Skeptizismus und Idealismus in der Antik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2009)。

<sup>11</sup> 除了上文提及的交织了哲学史意识的学述传统之外,值得提及的还包括柏拉图的历史意识考察,关于这一主题可以参 Konrad Gaiser, *Platon und die Geschichte*, (Stuttgart: Frommann, 1961, 笔者中译文载于《清华西方哲学研究》2016年第1期)。关于亚里士多德与哲学史书写问题的讨论,参 William Keith Chambers Guthrie, “Aristotle as a Historian of Philosophy. Some Preliminaries,” *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LXXVII (1957): 35–41; Stevenson J. G., “Aristotle as Historian of Philosophy,” *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XCIV (1974): 138–43; Catherine Collobert, “Aristotle’s Review of the Presocratics: Is Aristotle Finally a Historian of Philosoph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40, no. 3 (2002): 281–95。

<sup>12</sup> 关于自我知识概念的历史变化,参 Ursula Renz, ed., *Self-Knowledge: A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 2017), 特别是导言。关于古希腊的自我和自我知识概念,尤其参 Christopher Gill, *Personality in Greek Epic, Tragedy, and Philosophy: The Self in Dialogue* (Oxford: Clarendon, 1996); Christopher Gill, *The Structured Self in Hellenistic and Roman Thought*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 2006). Richard Sorabji, *Self: Ancient and Modern Insights about Individuality, Life, and Deat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 2006)。

<sup>13</sup> 这方面的研究很多,一个较新的论文集参: Erling Michael and Heßler Jan Erik, *Argument und literarische Form in antiker Philosophie* (Berlin, Boston: De Gruyter, 2013)。

派或学者也尊重并实践这一规则，例如 Iamblichus 对于秘仪的论证<sup>14</sup>。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哲学始终是希腊的，尽管其讨论方式和话题已经发生了大量变化。

4. 与生活形式和实践紧密相系：尽管论证往往作为哲学讨论的必要条件，但哲学家很少满足于局部论证的胜利，而是习惯于将论证与论辩与灵魂以及生活的选择等问题相联系。<sup>15</sup>

5. 广泛的社会影响力：狭义的学院哲学是近代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后的产物，也是当代的哲学主流；而古代基本没有当代意义上的学院哲学家。古代哲学的实践性不仅体现在其包含今天称之为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主题，更在于哲学本身就吸引各个阶层的参与，进而影响和渗透到社会、政治、教育和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sup>16</sup>。

上述描画远远称不上精确和完备，但我希望它，作为初步的勾勒，足以吸引当代读者对于古希腊和罗马哲学产生兴趣，并且以哲学的方式去反思其文本和问题。因为我始终相信，兴趣是我们探究的第一步，也是我们不满足于泛泛而谈，而深入持续追问的核心动力之一。

## 2 古代哲学：在哲学与历史之间

古希腊哲学本身丰富多彩，不同时代的读者和研究者也有着自己的方法和关怀，无论从理论还是历史的角度看，都没有唯一正确进入这一领域的方式。每一个读者或研究者，一方面受到学术和文化共同体的限定，一方面由于自身兴趣的影响，她难免采取自己的进路来考察古希腊的哲学世界，这无疑在原则上是合理的。不过，进路的多元性并不代表进路之间没有优劣，更不代表我们可以不受限制地以任何方式进入到古代哲学的世界，作为学术研究者来说更是如此。因为，哲学和历史的区分是一回事，好学术/坏学术以及学术/非学术是另一回事。下面我试图考察这种限制，因为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我们才能谈论可能性和多元性以及各种进路之间的交织或融合。

### 2.1 哲学与历史

---

<sup>14</sup> 这一特征或许在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以及晚期古代会有较大争议，这里不能详论。但前苏格拉底哲学的理智主义解释，可参 J. Barnes, *The Presocratic Philosophers* (London: Routledge, 1982)。

<sup>15</sup> 由于古代哲学家对于生活的关切，P. Hadot 将『精神的历练』视为所有哲学家或者流派的目标，参 Pierre Hadot, *Philosophy as a Way of Life: Spiritual Exercises from Socrates to Foucault / Ed. with an Introd. by Arnold Davidson ; Transl. by John Michael Chase* (Oxford ; New York: Blackwell, 1995, 有中译); Pierre Hadot, *What Is Ancient Philosophy ? / Transl. by John Michael Chas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 2002, 有中译)。这一规定尽管具有启发性，但他似乎没有必要地将这一特征与各种形式的理性探究对立起来。哲学生活与理智活动相互结合的叙述，参：John Cooper, *Pursuits of Wisdom: Six Ways of Life in Ancient Philosophy from Socrates to Plotinu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 2012)。

<sup>16</sup> 这里并不否认古代有各种各样的哲学学院或者学派，但其建制和目标迥异于当代研究性大学。关于古代哲学与社会关联的考察，可以参 Johannes Hahn, *Der Philosoph und die Gesellschaft. Selbstverständnis, öffentliches Auftreten und populäre Erwartungen in der hohen Kaiserzeit*, (Stuttgart: Steiner, 1989); Gillian Clark and Tessa Rajak, eds., *Philosophy and Power in the Graeco-Roman World: Essays in Honour of Miriam Griff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 2002)。

由于古代哲学既是一门关于过去，从而涉及历史的学科，但同时又是哲学的重要构成部分之一，如何做古代哲学就首先面临哲学史与哲学的关系这一经典问题<sup>17</sup>。两者的张力尤其在战后英美哲学崛起的语境下显得尤为突出，因为这一哲学思潮的特征之一就是去除哲学史的负担，而试图以类似自然科学的方式类似直面问题与论证。这里，至少有四种对待古典哲学的立场可以区分<sup>18</sup>：1. 如果古代哲学仍旧是一种**哲学**，那么我们必须做一种“无历史”的古代哲学，因为哲学追求真理，而真理是非历史性的。这样，我们只关心其中对于**当代哲学而言**有启发的或意义的论题和论证，我们对古希腊罗马哲学家就像对待当代同行一样去考察他们论题和论证的有效性。这一进路以『理性重构』（rational reconstruction）为标识，有时也被称为『同行主义』（‘collegialism’），其最为知名的轶事就是据说来自牛津哲学家赖尔（Ryle）的劝告：『我们应该像读刚刚出版的《心灵》（*Mind*，按：牛津大学出版社旗下著名哲学刊物）杂志那样阅读柏拉图的作品！』<sup>19</sup> 2. 与之相反，也有学者希望给一种『无哲学的哲学史』（non-philosophical history of philosophy）留下空间，既出于劳动分工，也出于个人选择。他们宣称并不关心所谓真理本身（如果有的话），也毫无兴趣捍卫某一哲学立场，更无野心成为哲学家<sup>20</sup>。与之相对，他们更愿意将自己的工作视为“侦探性的”，就像连接残缺的拼图或者解开一个字谜<sup>21</sup>。3. 如果说前两种看法，都看重哲学与历史的区分，第三种则强调了二者的结合，黑格尔『哲学就是哲学史』的信念可谓其代表。按照这一看法，由于哲学活动本质上的历史性，做哲学本身就要求不断回到历史；而同时由于古代哲学本身的重要性，对之考察自然就是无可争议的哲学活动，并不需要额外的辩护<sup>22</sup>。4. 第四种看法仍旧保持哲

17 关于这一方面的文献汗牛充栋，中文方面值得推荐吴天岳“向哲学史说是”，载于《外国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总第29辑，20-31页。英语学界一些有代表性的讨论，可参 E. Schliesser, J. B. Schneewind, and Q. Skinner, eds. *Philosophy in History: Essays in the Historiography of Philosophy. Ideas in Contex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M. Wilson, “History of Philosophy in Philosophy Today; and the Case of the Sensible Qualities.”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101 (1992): 191-243; Tom Sorell and G. A. J. Rogers eds., *Analytic Philosophy and History of Philoso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M. Lærke, E. H. Smith, and E. Schliesser, eds. *Philosophy and Its History: Aims and Methods in the Study of Early Modern Philoso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18 哲学上极端的“科学主义”者认为**哲学上**并无理会古代哲学的必要，因此无论何种进路的古代哲学研究都不足以称为哲学的一部分。由于本文无意于与这一想法论辩，因此这里略过此种立场。

19 对这一进路的戏谑式刻画可参 Barnes 的论文 ‘Anglophone attitude’，载于 Barnes 2011, 43-69, 尤其是 56-60。根据 Barnes 2011, 19 的回忆，当年作为学生在牛津学习时，黑尔（Hare）也给过他类似建议：Barnes 本意分析柏拉图对于知识与意见的区分，黑尔推荐了柏拉图的《美诺》，Ayer 和一些新近出版的文献时，并且教导他不必关心柏拉图或 Ayer 本人怎么想，而仅仅关注论题。这一进路不仅存在于古代哲学的研究中，也曾经流行于英语世界各个时代的哲学史研究，并且产生了不少值得称道的研究作品，例如 P. F. Strawson 在 1966 年出版的康德研究《意义的界限》（*Bounds of Sense*），早期近代哲学领域 Jonathan Bennett 于 1971 年出版的《洛克、伯克利、休谟：核心主题》（*Locke, Berkeley, Hume: Central Themes*）以及罗蒂 1979 年出版的《哲学和自然之镜》（*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当下所谓匹兹堡学派的不少结合了历史研究的哲学作品也多少呈现出这一特征。

20 明确提出这一看法的是 Jacques Brunschwig, “Faire de l’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Aujourd’hui,” in *Nos Grecs et Leurs Modernes: Les Stratégies Contemporaines d’appropriation de l’Antiquité*, Coll. Chemins de La Pensée (Paris: Éd. du Seuil, 1992), 67-96. 对之的批评可以参 Barnes 的 “Philosophy within quotation marks?”, 载于 Jonathan Barnes, *Essays in Ancient Philosophy: Method and Metaphysics* (Oxford: Clarendon Pr., 2011), 23-42。

21 “侦探性的”，而与“永恒真理”无关，这一说法来自我的老师 Michael Franz 口头上对于自身研究的描述，他的主要领域是早期德国唯心论，特别是荷尔德林。而在古代哲学领域，接近于实践 Brunschwig 理论的典型研究或许是后文将提及的 J. Mansfeld, D. T. Runia 以及他们学生对于整个学述（doxographical tradition）的考察（参本文第三章）。

22 需要注意，这里论述的并非黑格尔本人的哲学史书写实践（他的实践或许可以归为某种特殊版本的“同行

学与历史的区分,但强调哲学——就哲学史研究而言——相对于历史的某种优先地位。换句话说,尽管哲学史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必然包含历史研究,但鉴于它作为哲学的一部分,就有必要优先地用哲学的眼光来考察历史材料。但不同于第一种立场,这里排斥『同行主义』的处理方式,也不把研究方式局限于『理性重构』,而是强调哲学考察以『正确理解本人』和『语境敏感』作为前提条件<sup>23</sup>。

上面四种观点并没有穷尽一切理论选项,它们之间也并非完全互斥<sup>24</sup>。但要论证和说明其中任何一种选项背后的道理与不足,并不是本文能够完成的任务。因为这涉及到哲学与历史的关系这一根本难题,有必要在别处进行单独分析和辩护。这里我毋宁关注的是这些差异与古代哲学发展的历史关联,同时说明这一问题的认识差别会影响我们研究的旨趣和目的,尽管它并不会直接决定我们在古代哲学领域的贡献。选项 1 和 3 无疑是两个最为极端的立场,他们分别代表了早期分析哲学的古代哲学研究和部分传统欧陆的古代哲学研究特征。在前者的方向上,我们难免想到战后英美哲学对于柏拉图第三人称论证以及亚里士多德功能主义的论争等研究。有趣的是,分析的古代哲学代表之一 J. Annas, 当她展望分析的古代哲学的未来时,也宣称这一类的研究是没有前景的<sup>25</sup>,但她似乎低估了相关研究的贡献,因为这一类研究尽管承担着时代误置的风险,但确实引发了有益的哲学讨论,为当下更为精致的探索实则做了铺垫和准备。后者的代表是兴盛一时的海德格尔式和伽达默尔式的古代哲学研究。虽然这一学派由于浮夸和晦涩甚至在德语学界内部已经是明日黄花,但不能否认它们曾经古代哲学研究诸多方面的推动,特别促进了实践哲学讨论的繁荣。与之相对,选项 2 和 4 或许可以视为古代哲学研究的当下主流,后者主要活跃在英语世界的哲学系,而前者则更多在欧陆,特别在古典系有着重要影响。尽管非哲学的古代哲学研究与哲学的古代哲学研究,从概念上看,有点儿像两个相互不容的极端,但他们的对立却有时仅仅是程度差异,不

---

主义”),而是黑格尔式的哲学观引导下的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理解。这一理解的具体内涵当然需要解释,但其共同点在于强调学的历史性。从这一共通前提出发,它以不同的形态并且以不同的程度影响着欧陆哲学长时间的工作。本文无暇呈现其复杂性,一个新近的对于黑格尔式的哲学史研究的发展和辩护,参 Pirmin Stekeler-Weithofer, *Philosophiegeschichte* (Berlin: De Gruyter 2006)。

<sup>23</sup> 这里立场实际为不少古代哲学的研究者所实践,而最近在理论上的讨论活跃在早期近代哲学,最近的一篇文章参 Christia Mercer. "The Contextualist Revolution in Early Modern Philosoph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57, no. 3 (2019): 529-548。

<sup>24</sup> 例如 Williams, 他对于哲学和哲学史关系的理解和本人的哲学史研究实践似乎在选项 1 和选项 4 之间摇摆。尽管 Williams 为哲学史进行辩护,但有时他的立场会接近上文提及的『同行主义』。尤其令人忧虑的是,他显得过于绝对地区分哲学史(哲学进路)和思想史(历史进路),并且认为只有前者——出于或为了**当代**的哲学兴趣——是唯一正确的**哲学**研究方法。不可否认,他敏锐地指出了由于哲学方法和历史方法的差异和张力,因此试图融合两者的努力可能既伤害了历史也未能贡献哲学;但他似乎过于悲观地否认不可能存在二者较为妥善的结合。参其论文“Descartes and the Historiography of Philosophy”,初载于 *Reason, Will and Sensation: Studies in Descartes' Metaphysics*, ed. John Cottingha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4), 19-27; 重印于 *The Sense of the Past: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ed. Myles Burnyea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257-264 (也可参吴天岳中译)。值得一提的是,Williams 后期逐步远离这里所谓的『同行主义』。这里无意于详细讨论 Williams 的观点,相关诊断的分析,可参 Hatfield, Gary.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as Philosophy." In *Analytic Philosophy and History of Philosophy*, edited by Tom Sorell and G. A. J. Roge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94; Barnes 2011 中的论文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sup>25</sup> Julia Annas, "Ancient Philosoph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The Future for Philosophy*, ed. Brian Leit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25-43。

仅被传统、研究机构、个人旨趣所影响,也由于研究对象和话题所限定。前苏格拉底哲学的研究难免引入大量的历史和语言的分析。与之相对,亚里士多德研究则一般而言哲学方面的讨论会占据优势。甚至在前苏内部,巴门尼德研究的哲学旨趣,一般而言,显然会高于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研究。在承认这一差别的前提下,同一学者可以做这两方面的研究<sup>26</sup>,同一研究也可能由这两个面相构成<sup>27</sup>,甚至某个单一的论证就是两者结合产物<sup>28</sup>。只是作为研究者,我们有必要保持对于研究目的和方法的清醒,不仅仅是宏观的设定,同时包括每一个步骤的目标与限度。它们是试图论证 X 事实上持有观点 F(作为一个历史事实),还是作者 X 有理由持有观点 F(理性重构)?是为了论题 Y 提供一个新解释,而是一个辩护?<sup>29</sup>是作者 X 的论题 Y 提供一个内部辩护,还是为同一论题提供一个外部辩护?<sup>30</sup>是辩护一个哲学家 X 的观点,还是辩护一个 X 主义的观点?X 主义是指起源于 X 的论点,还是受到 X 激发的论点,或者以其他方式与 X 相系从而有理由被视为 X 主义下的观点?等等。

那么,如果可以给予一个最小化的共识,尽管古代哲学可以以各种方式来做,但任何合格的研究者都需要至少懂得必要的历史与哲学知识,尤其需要根据研究对象和目标的不同,平衡二者的关系。即使对是一个仅仅关心哲学的研究者,懂一些历史,不仅是为了避免时代误置,而且对于不少题目而言,广义性质的研究是理解、评估或重构哲学论证的前提或构成部分。尤其在当下,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不满足于在脱离语境的条件下,对古代哲学家的某些

<sup>26</sup> 由于合格的古代哲学研究者通常需要对于相关历史的把握和敏感,因此大量的古代哲学研究者也从事广义的历史研究工作,这并不让人惊讶。甚至偏分析方向的古代哲学代表学者 Vlastos, M. Frede, M. F. Burnyeat 以及 Barnes 等都做过大量历史考证工作,这里不再冗述。M. Frede 甚至在 1989-90 年的 the Nellie Wallace 讲座中,猛烈评价同行主义和黑格尔式的哲学史,而将其认同的哲学史书写称之为“历史的哲学史书写”(historical history of philosophy)。不过,这一命名无疑具有误导性,因为 Frede 的实践表明其所从事的哲学史研究显然并非我们这里的选项 2。关于 M. Frede 的观点,参新近出版的遗作 M. Frede: *The Historiography of Philosophy* (Oxford, 2022)。

<sup>27</sup>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有代表性的比如 John Palmer, *Parmenides and Presocratic Philoso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A. P. D. Mourelatos, *The Route of Parmenides* (Las Vegas, NV: Parmenides Publishing, 2008)。这两本专著在哲学和历史方面都做了出色的工作。

<sup>28</sup> 让我们仅仅局限于狭义的哲学论证。即使在这一限定下,我们也不可否认,一方面,哲学论证具有多种形式——它可能是一个简单三段论,也可能是归谬论证(argument ad absurdum),可能是诉诸最优解释(best explanation)的论证,也可能是诉诸善意原则的论证,等等——;另一方面,通过这些论证,研究者往往试图达成不同的目的,有这些是为了证实(verify)某些论题,有些则意在评价(evaluation)或者诊断(diagnosis)。无论怎样的目的或者意图,如果需要保证论证的合理(reasonable)和可信(persuasive),形式上的有效性往往并不充分(adequate),何况一些论证甚至并不要求这种有效性(例如诉诸最佳解释的论证);而其他条件的考量,例如概念的清晰和准确,就需要语文学或者历史工作的帮助,有时作为工具,有时作为论证的一部分。关于这一点,下文我还会有少量个案说明。

<sup>29</sup> 这里的辩护我主要指哲学的或者理论的辩护,即研究者对于相关论题或论证合理性有所支持并且提供相应的论证。它可以在旧解释的基础上展开,也可以建立在新解释之上。而与之相对,新解释主要着眼于对于对已有材料提供新角度或新说法,但并不涉及解释者对于涉及论题的进一步认同和辩护,甚至也可以兼容一个敌对的态度。例如,我可以认为前人误解了亚里士多德的“中道理论”(the Doctrine of the Mean),因为提供了一个新理解。或许我认为这一理解更附和哲学家的本意或更忠实于文本,但我也可以同样认为这一版本的中道理论是对美德本质的误解。

<sup>30</sup> 内部和外部总是相对于某个界限而言的。如果我把哲学家本人的理论世界作为界限,那么比如完全利用这一理论内部资源的辩护就是内部辩护,其他则是外部。这样,用柏拉图来捍卫柏拉图就是内部辩护,而诉诸于当下理论辩护柏拉图则是一种外部辩护。但也有可能我把内部辩护理解为所有诉诸于理论理由的辩护,而外部辩护理解为诉诸于理论理由之外的辩护。这样,如果我给出某种理由捍卫柏拉图的理论 Y,就是内部的辩护;而诉诸于非理论的理由——例如社会、习俗、文化或心理等因素——就是外部的辩护。



只言片语进行当下化的利用或攫取。因为这一行为就像尼采提及的“最糟糕的读者”：他们“行事就像一个掠夺成性的士兵：拣出所为己所用的些许物品，玷污和扰乱剩余，并且褻渎整体（《人性的，太人性的》II 137, KSA 2, 436）”。与之相对，更多人意识到，历史尽管不可复现，但对于它的哲学利用并不代表一定需要以某种“非历史”的方式进行。

毋庸置疑，古代哲学研究者，至少大多数，自然会倾向于认为这一领域在**哲学上**也是重要的，或者至少是有吸引力的。不过即使在这一确信下，其哲学意义仍旧可以从多方面来理解：有时，某些希腊哲学的思想可能印证和加强了我们当代的某些信念，毕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有时，古代的思想恰恰提供了对于当代思考而言的**陌生者**，通过避免当代的某些教条，从相反的角度丰富了当代哲学<sup>31</sup>。除了已经耳熟能详的德性伦理学和德性知识论之外，形而上学领域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情感哲学中的新斯多亚主义等都受惠于古代哲学的激发。而在心灵哲学领域，在评价 Caston 的亚里士多德解读时，普特南甚至说（这里涉及的是心灵和意向性问题）：

Caston 希望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读到一个更“现代”（modern）的观点，因为他相信这更为现代的观点**运作良好**（works）；但我认为这现代的观点是一个灾难，而亚里士多德的思考更为优越。<sup>32</sup>

无论在这一具体问题上谁是谁非，这一对立本身让我们看到古代哲学可能从多方面——甚至从两个完全相反的方面——拓展或深化我们的哲学考察。与之类似，即使是一个仅仅关心历史的研究者，哲学分析有时反过来是历史重建的必要条件，甚至有时可以帮助你修复和重建相关的文本关系<sup>33</sup>。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任何古代哲学研习者，无论你兴趣和进路何在，一定的哲学知识是你能否定位研究的目标、限度与可能性的重要依据。有了这样一些限定，我们甚至可以宽泛地说，与其他科学一致，在古代哲学研究之中，只要能够提出有意义的问题，并且以严格和清晰方式给予论证，那么你就很有可能做出好的研究。与之相对，如果你的研究缺乏必要科学的方法和论证——无论是为意识形态所主导，还是缺乏基本的训练所导致，或者其他原因——那么它的价值自然就十分可疑。

<sup>31</sup> 后一个观点往往与尼采所谓的哲学的“不合时宜性”联系在一起，在 Williams 对于哲学史的哲学价值辩护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参其论文“Descartes and the Historiography of Philosophy”，前引）。

<sup>32</sup> H. Putnam (2012), *Philosophy in an age of science. Physics, mathematics and skepticis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588-9, 粗体字属于原文)

<sup>33</sup> 例如，在 W. Cheng (2017) “A Battle Against Pain?: Aristotle, Theophrastus and the Physiologoi”, *Phronesis*, 62,, 392-416 的前半部分，我论证了传统的研究者没有意识到 Aspasius (*In EN* 156.14-22) 在哲学上误解了亚里士多德，其中引发的文本问题因此并不能依靠各种历史-语文学手段修复。那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段文本不能作为 Theophrastus 和亚里士多德等人哲学观点的文本证据（传统的解读习惯于依赖它），亚里士多德、Theophrastus、Aspasius 三人的对话需要重新描述；而从哲学上说，亚里士多德被评注的文本需要一个不同于新解读，它不同于深受 Aspasius 影响的传统解读。

## 2.2 案例

既然我们已经宏观地勾勒了古代哲学的一些特征,尤其是其中历史与哲学的微妙关系,让我们用少量例证,从不同的角度,来说明哲学与历史/文献的可能交织。假设我们面对一个论证:

如果 P, 那么 Q.

P

因此 Q

如果当代哲学家要检验这个论证,首先需要考察这里的**推论**是否有效(valid),其次进而分别这里的前提结论是否清晰和可靠,在此基础上分析这个**论证**是否健全(sound)和让人信服(persuasive/convincing)。但在古代哲学领域,我们的工作常常不止于此。让我们以 Stopper 和 Brunschwig 等人关于怀疑论的一个经典讨论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sup>34</sup>。这里涉及的论证表面具有『P, 因此 Q』的形式,即 P 给出 Q 的根据或者理由。但这里需要补充两个信息:首先,尽管我们这里考察的是通常归于皮浪(Pyrrho)名下的论证,但这一论证据说来自其后学 Timon 的记载,而 Timon 的记载又来自保留在 Eusebius 那里的 Aristocles 的残篇《论哲学》(de Philosophia)。其次,这一论证的文本表现形式是『P, *dia touto* Q』(*dia touto* 意为『由于它』,即 because of P),但这一文本本身具有争议<sup>35</sup>。于是,我们看到,古代哲学的研究者可能并不能直接评估论证『P, 因此 Q』。为了评估『P, 因此 Q』,除了上文基本的哲学分析,她至少还需要考量『P, 因此 Q』本身的来源和地位(status)。换句话说,如果想充分地理解和评估这一论证,除了上文提及的 P 和 Q 的含义,以及推论的效力等之外,她还需要至少考虑:(1) 文本的流传史,尤其是 Pyrrho、Timon、Aristocles 和 Eusebius 之间的关系;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我们才能较好的判断这一论题的意义以及其在早期怀疑论那里的位置<sup>36</sup>。(2) 文本本身与论证的关系。因为按照 Stopper 的看法,如果我们接受通行的读法『P, *dia touto* Q』,我们实际得到了一个明显荒谬的推论<sup>37</sup>。为了拯救这个论证,他追随 Zeller,

<sup>34</sup> 相关讨论参 M. R. Stopper (1983) 'Schizzi Pirroniani' *Phronesis* 28: 265-97; J. Brunschwig (1994) 'Once again on Eusebius on Aristocles on Timon on Pyrrho' in his *Papers in Hellenistic philosophy* Cambridge:190-211。

<sup>35</sup> 『P, *dia touto* Q』的表述借鉴了 Barnes 2011, 35-6。谈及的文本是 *Praep. Evang* 14.18.3: τὰ μὲν οὖν πράγματα φησιν αὐτὸν ἀποφαίνειν ἐπ' ἴσης ἀδιάφορα καὶ ἀστάθμητα καὶ ἀνεπίκριτα, διὰ τοῦτο μήτε τὰς αἰσθήσεις ἡμῶν μήτε τὰς δόξας ἀληθεύειν ἢ ψεύδεσθαι (“他【Timon】说他【皮浪】宣称事物都是无区分、不稳定和非决定性的;因此,我们的感觉或意见既不真也不假”)。

<sup>36</sup> 就 Aristocles 和 Eusebius 的关系而言,我们知道后者经常直接引用前者的原文。但是这一特征并不适用于 Aristocles 和 Timon 的关系。Brunschwig 1994: 193 论证说,我们这里拥有的应该是 Aristocles 对于 Timon 观点的总结,而非直接引用。不过由于皮浪并不写作,他与 Timon 的关系就更为复杂。尽管大多数学者认为 Timon 是一个可靠的报告者,但在这里『P, *dia touto* Q』是归给 Timon 还是归给皮浪本人仍旧有学术争议。与多数研究者不同, Brunschwig 1994 论证认为这里涉及的是 Timon 的观点,而非皮浪。他的部分论证建立在对于 *Praep. Evang* 14.18.3 的语言分析之上。他认为“φησιν αὐτὸν ἀποφαίνειν”(Timon “说他【按:皮浪】宣称”)只涵盖最邻近的不定式结构(终止于 ἀνεπίκριτα), *dia touto* 之后的文本应该是 Timon 本人的结论,而非皮浪的推论。

<sup>37</sup> Zeller 本人并没有给出修订的理由,而 Stopper 认为原文背后的推论荒谬是因为他认为只有在感觉无法确认事物的前提下,才可以谈论事物性质的不确定。无疑,这里他将“无区分、不稳定和非决定性的”分别理解为“我们无法区分,我们无法估量和我们无法决定”。而只有以“我们的感觉是不确定的”为前提,他认为,我们才能得出我们无法区分,我们无法估量和我们无法决定事物的性质。值得注意, Stopper 对于“无区分、

提出了非常有趣的文本修订建议，将『*dia touto* Q』改为『*dia to* Q』（因为 *dia to* 被误传为 *dia touto* 在古文书学上的确是可能的，而『P, *dia to* Q』意思是“由于 Q”）。按照这一建议，这里的论证就不再是『P, 因此 Q』，而是『P, 由于 Q』，这样 P 从根据/理由变成了结论，而 Q 则从结论变成了根据/理由。这样以一个经济的修订，Stopper 认为不仅挽救了 Aristocles 的记载，更为重要的是，以此得到了一个哲学上似乎更有意义的论证。

这里我无意于具体评估这一具体的怀疑论论证<sup>38</sup>。但我希望这一案例足以展示，在古代哲学领域，评估一个哲学论证常常涉及到多方面的理由——文献流传的、文本校勘的、古文书的、语言的、逻辑的、理论的，等等——，并且这些理由在不同的层面上相互交织或者相互排斥。一个好的研究者需要平衡各种相关因素，需要找到什么是主导性的，什么是次要的；哪些理由可以结合或聚集，哪些则相互排斥。在我们的案例中，Brunschwig 并不接受 Zeller 和 Stopper 的提案。他不仅从语法和文献流传的角度上提出异议，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找到了一种『P, 因此 Q』的新读法，根据这一读法，论证『P, 因此 Q』非但不荒谬，而且导向了某些对于早期怀疑论的新解释。假设他的论证是可信的，我们看到哲学理由如何一方面帮助我们增进对于文本的哲学理解，另一方面同时也捍卫了传统的文献流传和读法。

类似于上文的讨论在古代哲学的研究中是大量发生的。让我们再看一个案例，它涉及到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第九卷的一段经典文本：

那正在看的人感到他正在看，正在听的人[感到]他正在听，那行走的人[感到]他正在走，以及就像在其他类似情况下：有某种东西感觉到我们处于活动之中，以至于如果我们在感觉，它就感觉到我们感觉；如果我们思想，它就感觉到我们思想。

ὁ δ' ὁρῶν ὅτι ὁρᾷ αἰσθάνεται καὶ ὁ ἀκούων ὅτι ἀκούει καὶ ὁ βαδίζων ὅτι βαδίζει, καὶ ἐπὶ τῶν ἄλλων ὁμοίως ἔστι τι τὸ αἰσθανόμενον ὅτι ἐνεργοῦμεν, ὥστε ἂν αἰσθανώμεθ', ὅτι αἰσθανόμεθα, καὶ νουῶμεν, ὅτι νοοῦμεν. (《尼各马可伦理学》1170a29-32)

这段话通常被视为是关于内感官 (inner sense) 知觉的早期经典论述<sup>39</sup>。类似于洛克的经典论述，亚里士多德这里似乎谈及了一种感觉能力 (*aisthesis*)，这种感觉不是直接指向对象世界，而是指向我们自身，即包含我们的感觉活动（看到红、听到音乐），身体运动（走）；也包含思想活动 (*noein*)。这一文本不仅对于解读亚里士多德本人，尤其是《论灵魂》3.2 具有

不稳定和非决定性的”的解释显然有争议空间，正如上文所谓，当面对 F『P, Q』的论证时，除了考察推论之外，明确 P 和 Q 的含义也是一个必要条件。在我们的案例中，P 的含义首先是一个争议点。除了 Brunschwig 1994 之外，W. H. Ausland (1989) “The moral origin of the Pyrrhonian philosophy” *Elenchos* 10: 359-434 也有不同的维持抄本读法的提案。

<sup>38</sup> 除了上文提及的研究，新近的讨论还可以参 J. Warren (2001). “Aristocles' refutations of Pyrrhonism (Eus. PE 14.18.1-10)”, *Proceedings of the Cambridge Philological Society*, 46, 140-164; S. Svavarsson (2010). “Pyrrho and early Pyrrhonism”, In R. Bett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ncient Sceptic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6-57.

<sup>39</sup> 参 C. Kahn (1966). *Sensation and Consciousness in Aristotle's Psychology*. *Archiv fü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48 (1-3), pp. 43-81.

重大意义，也常常被视为西方哲学最早的关于『意识』（这里被视为一种内感官能力的运作）的经典表达之一。但是如果我们查看这段文本的校勘栏，我们会发现这一哲学史定位并没有得到如此直接的支持。因为上文提供的文本其实并非忠实于抄本，而是根据 Bywater 在 19 世纪成书并且迄今最为流行的《尼各马可伦理学》校本。与之相对，EN1170a31-2 抄本中的读法实际上是 αἰσθανομεθ' ἄν ὅτι αἰσθανόμεθα καὶ νοοῖμεν ὅτι νοοῦμεν。也就是说，Bywater 将抄本的 *aisthavoimeth' an* 改为 *an aisthavoimeth'*，而将抄本的 *kai nooimen* 改为 *kan noōmen*。如果按照抄本读法，那么后两行应该翻译为『以至于我们**感觉到**我们感觉，我们**思想**到我们思想』。如果按照这一读法，那么亚里士多德就并没有谈及一个统一的内感官概念，而是指出认知活动——无论是感觉还是思想——似乎都包含了某种自反结构，这种自反结构使得当我们运行具体的心灵活动时伴随着了某种自我意识或者指向自我的意识。例如，当我们看到某种红，我们也同时感觉到我们的看；与之类似，当我们思考  $5+7$  是否等于  $12$  时，我们同时意识到——**通过思想，而非通过感觉**——我们的思考。这样，按照校本的读法，亚里士多德从个别事例拓展到内感官对于整个认知的统摄；按照抄本的读法，亚里士多德首先从个别事例拓展到内感官对于感觉直接的统摄，随后利用类比（认知与感觉具有同构性），说明认知具有同样的双重结构。于是，我们看到，校本和抄本实际保存了两种相当不同的意识理论框架：而可以设想，为了充实或辩护它们，有更多的理论和论证可能被提出和发展。

事实上，Bywater 并不是出于历史的或者语文学的理由修订文本，而是有意无意地受到了洛克以来流行的内感知理论的影响而改变了抄本读法，从而将亚里士多德的文本，在没有稿本基础的情况下，修订成符合 19 世纪英国主流哲学的提案。他没有意识到抄本读法在哲学上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可能蕴含哲学上更有吸引力的提案。如果我们轻易接受这个文本，而没有关注文本的流传和校勘情况，那么，从历史的角度，我们很可能将这个受到 19 世纪哲学影响的校订视为沟通亚里士多德和 19 世纪心灵哲学的桥梁，从而虚构了一段思想溯源关系；而从哲学的角度，我们则可能错过古代哲学提供给我们理解意识或者自身体验的其他理论可能。<sup>40</sup>

### 3. 古代哲学的论域与特征

正如之前所谓，古代哲学既是哲学的一部分，也是哲学史的一部分，同时是古代研究（Altertumswissenschaft）的一部分<sup>41</sup>。尽管其中哲学与历史以及其他因素的平衡相当复杂并且饱含争议，但这一特征却可以方便我们分别从广义的历史和哲学这两个角度来论述我们如何开始相关的阅读和研究。

<sup>40</sup> 对 Bywater 的批评，参 Victor Caston, "Aristotle on Consciousness", *Mind*, Volume 111, Issue 444, 2002, Pages 774-5。

<sup>41</sup> 这一特征从当前从业人员的编制也可以看出。首先，不少哲学系——尤其是多数拥有崇高声誉和悠久历史的哲学系——都拥有古代哲学方面的学者；其次，尽管绝大部分古代哲学的研究者位于哲学系；但也有不少尤其是欧陆传统的古代哲学学者在古典系。十分有趣的是，英国的两个古代哲学重镇的编制差异巨大，牛津的古代哲学学者几乎都聚集在哲学系，而剑桥基本在古典系。

既然古代哲学的研习首先需要与文本打交道——例如阅读文本、解读文本和评价文本，那么做古代哲学首先就要了解古代文本。但由于古代文本自身的特征，如何合适地与古代哲学文本打交道实则对古代哲学的研究者构成了相当的挑战。这种挑战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语言的挑战：古代哲学的文本主要由希腊语或拉丁语写就，而阿拉伯文、叙利亚语等其他语言也保留了部分相关文献。同时，由于大量的当代二手文献由德语、法语、意大利语等写成，因此，与当代主流以英语为核心的哲学研究不同，这一领域对于研究者有着古代语言和现代语言的额外要求。当然，由于研究对象和目标的差异，这一要求也是灵活并且有弹性的。例如，如果集中于亚里士多德或者柏拉图等作者的核心文本，英语仍旧是统治性的；而如果转向伊壁鸠鲁派或医哲盖伦，法语和意大利语的要求就会相当迫切。

与之相系，由于古代语言与现代语言及其背后所承载的理念和文化的差异，为了解文本，我们还需要对于语义和文本意图保持足够的敏感。这些敏感不仅依赖于我们对于目标语言词法和句法的熟悉，也则依赖于对于文风、语用、修辞和文化背景等因素的了解。这样我们就需要一个广义的**语文学背景**来帮助我们尽可能地接近接近这一目标。

更为困难的是，与现代文本不同，我们并没有古代作者的手稿，也没有他们许可的印本传世。即使保存较为完好的柏拉图，我们拥有的也是距离作者生年已经相隔千年中世纪的抄本；而前苏格拉底作者、早期斯多亚派甚至只有残篇证言传世，其中一些作者甚至只有二手或 n 手的证言。这一困境就要求我们一方面掌握一定的文本流传知识，知道不同的作品是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呈现于我们面前；另一方面，只有掌握一定史料考订（source criticism/ Quellenforschung）方面的知识，了解相关文本和作家之间的关系。例如早期希腊哲学作品的流传尤其依赖于后世作家的引用或记载，只有在了解了这些作家或作品关系之从属关系的基础上，我们才可以对一个相关的理论或者论述做出更为周详的判断。事实上，前文提及的关于皮浪和早期怀疑论的争议就足以让我们看到文献流传的考察对于古代哲学研究的重要性。与之类似，Diels 对于早期自然哲学史料关系的重构也提供了一个经典的史源考证实例（参下页：**图 1**）<sup>42</sup>；由此开启的早期希腊哲学研究更充分展示了文本和史料流传的知识如何与校勘、古文书学和语法史等方面的知识综合起来，贡献于古代哲学的科学研究。

<sup>42</sup> Diels 的这一研究构成了他编辑《前苏格拉底哲人残篇》的基础，这一文本迄今是早期希腊哲学研究不可取代的成果。当然他重构的图景和方法论已经受到多方面的批评，特别是 Mansfeld, J., & Runia, D.T., 合著的 *Aëtiana I-IV* 四卷本，Leiden: Brill, 1997-20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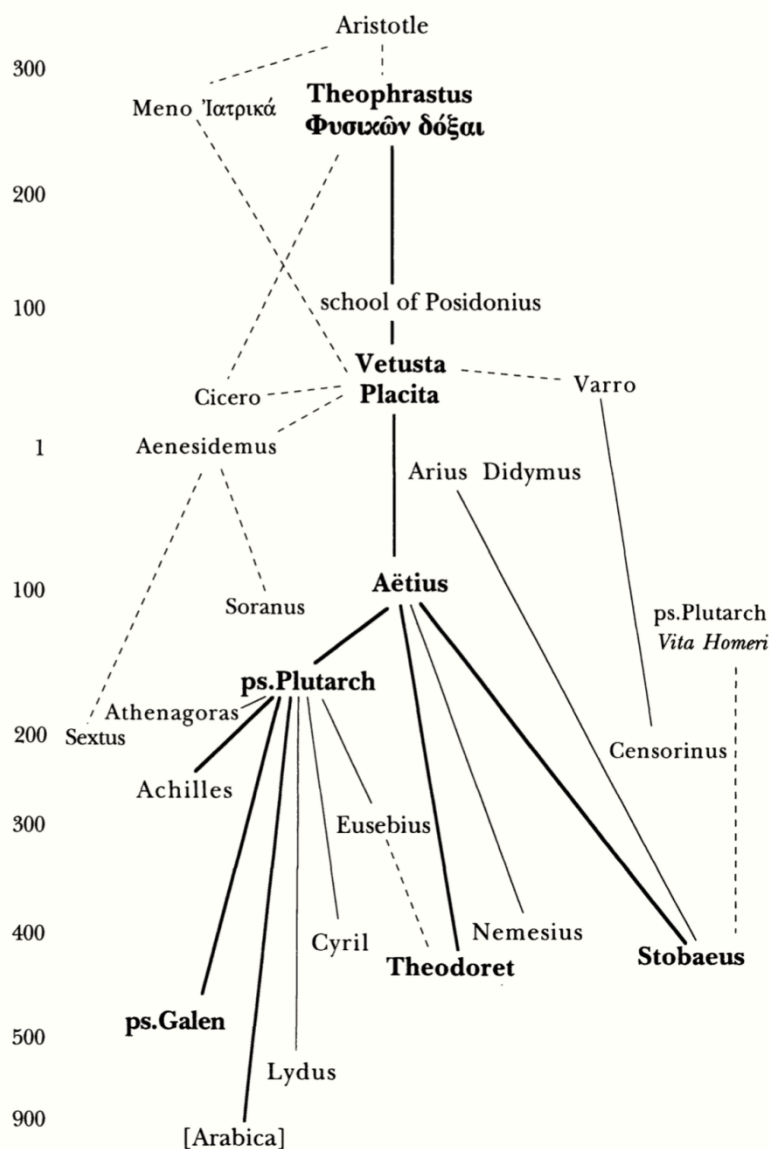


图 1: Diels 对于早期希腊自然哲学史料来源的重构, 来自 Mansfeld, J., & Runia, D.T., 1997, *Aëtiana: The Method and Intellectual Context of a Doxographer* (Volume I: The Sources), Leiden: Brill, 81

除了语言和文献流传之外, 古代文本的复杂性也体现在文类的多样性之上。如果说当代哲学的载体主要是论文和专著的话, 古代哲学则具有更为多元的呈现方式, 除了著名的对话体之外 (尤其是柏拉图), 讲稿 (亚里士多德)、诗歌 (例如巴门尼德, 恩培多克勒以及卢克莱修)、书信 (例如伊壁鸠鲁)、注解 (例如 Proclus 和 Simplicius) 等都是相当流行的形式。这就要求研究者不仅对于内容敏感, 而且需要严肃对待其载体与形式。甚至口传的哲学也从苏格拉底一直到新柏拉图主义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这一因素也成为诸多古代哲学论证和讨论灵感的来源。<sup>43</sup>

<sup>43</sup> 关于口传与哲学的关系, 值得关注的包括古典学界主要围绕 Havelock 等人的研究争议以及柏拉图学界围绕图宾根-米兰学派的论战。关于文类与媒介的研究, 可参 Althoff, Jochen, and Wolfgang Kullmann.

不过与进行中的当代哲学不同, 也与古代研究的其他领域(例如抒情诗、考古学等)不同, 古代哲学的史料总量是相对稳定的。除了零星的新发现, 古代哲学的核心文本比较集中, 尤其是经典时期和前苏格拉底时期的文献大多都得到了较好的整理、翻译和注释, 这也减少了学习和研究的难度。当然, 少量铭文, 特别是纸草以及复写本等方面的新发现也提供了一些令人振奋的新材料, 因此这些方面的研究也值得古代哲学研习者关注, 尤其是 Herculaneum 纸草对于伊壁鸠鲁学派研究的贡献是无可比拟的。<sup>44</sup>

当然, 既然古代哲学的研究往往需要在哲学上了解涉及的主题, 甚至有时也希望自身贡献于当下哲学的讨论, 那么文本就不会是这一学科唯一的关切, 因为我们在阅读和理解文本之外, 还需要分析、解释和评价所涉及的概念和论证。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试图严肃地进入到古代哲学研究之中, 我们需要懂得一些哲学, 以哲学的方式与这些文本打交道。但在什么意义上才能合理地运用哲学甚至也贡献于哲学呢? 我想, 这里可以从内容和方法两个方面来说明。

就内容而言, 也正如之前提及的, 古希腊人自己就没有一个统一的哲学概念, 而哲学的外延与内涵在当时已经处于变动和争议之中。与之类似, 古代哲学研究的含义和关切也经历着变化, 这种变化一方面受到哲学史书写的影响, 另一方面受到当下正在进行的哲学活动的影响。在这几个方面的互动才构成了我们当代主流的古代哲学研究, 也参与构成了每个研究者自己心中的古代哲学研究。

在这一背景下, 古代哲学不仅仅因为它包含对于历史的研究从而注定具有跨学科性质, 而且也因为其中蕴含的哲学概念的流动性必然是跨学科的。比如, 宇宙论和天文学的知识对于理解前苏格拉底哲学, 理解柏拉图的《蒂迈欧》以及亚里士多德的《论天》的核心内容都不可或缺, 而 Proclus 的欧几里得注释不仅是数学史, 也是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重要文献。尽管这些主题可能被归于科学史, 甚至天文史、医学史和数学史这样的专门史, 但对于古代哲学的研究者而言, 既要了解学科的界限, 但也要把握它们的关联, 而不是先入为主的进行划界。同样, 对于古代尤其是亚里士多德或斯多亚的逻辑学研究, 我们离不开对于同时代语法、修辞以及其他相关著作的考察<sup>45</sup>。直接以**我们的**哲学概念(这同样有争议)来套用古代哲学的概念尽管有时不可避免, 甚至在一些案例中有部分合法性, 但常常是危险的。举例来

---

1993. *Vermittlung und Tradierung von Wissen in der griechischen Kultur*. Tübingen: Narr. Kullmann, Wolfgang, and Michael Reichel. 1990; *Der Übergang von der Mündlichkeit zur Literatur bei den Griechen*. Tübingen: Gunter Narr; Kullmann, Wolfgang. 1998. *Gattungen wissenschaftlicher Literatur in der Antike*. Tübingen: Narr. Brill 出版社“Orality and Literacy in the Ancient World”系列出版的论文集部分内容也值得参考。

<sup>44</sup> 对于古代哲学而言, 值得关注的发现包括达维尼纸草(Derveni Papyrus), 斯特拉斯堡纸草(The Strasbourg Papyrus), Diogenes of Oinoanda 铭文, 疑似 Porphyry 的 *Ad Gedaliu* 残篇(参 Chiaradonna, Riccardo; Rashed, Marvvan; Sedley, David & Tchernetska, Natalie (2013). “A rediscovered categories commentary”. *Oxford Studies in Ancient Philosophy* 44:129-194); Galen 的 *De indolentia* (文本的校勘本收录于 Les Belles Lettres 系列; 全面的研究文集参 C. Petit (eds.) (2018). *Galen's Treatise Περὶ Ἀλυσίας (De indolentia) in Context*. Leiden: Brill) 以及 Herculaneum 纸草等。Herculaneum 的研究已经汗牛充栋, 除了大量的专著、论文和翻译注释, 可以关注专注于这一方向的杂志 *Cronache Erolonesi*。

<sup>45</sup> Michael Frede 在其 1987 年出版的论文集的导言中尤其强调了这点, 参 M. Frede, *Essays in Ancient Philoso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说,前苏格拉底哲人或者早期自然哲学的概念尤其令人不安,尽管大体上我们已经有了稳定的人选和文选,但他们是否应该作为一个**集体**被命名,他们是否应该被视为哲学的起源或者开端,甚至他们与被排除出“正典”(Canon)的文本之间是否就是哲学与非哲学的差异,这些每一点都值得质疑。

这里,让我以一般被视为科学史的一部分的希腊医学和我们的核心关切“希腊哲学”的关联为例来进一步澄清这一问题。从当代的视野来看,医学是为了救病治人,哲学则关注理论概念探讨,二者似乎并没有深厚的交集。尽管上述区别在古希腊并非不存在,但是我们需要意识到,古希腊同时也存在一个偏向理论的医学传统,它与哲学传统——特别是早期希腊自然哲学传统——关系密切,有时甚至难以区分。亚里士多德自己就说过:

就健康和疾病而言,不仅仅是医生,同时也是自然研究者的任务在某种程度上考察其原因。然而,不应该忽略的是,在什么意义上他们不同并且他们研究不同的东西,既然事实证明,他们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是连续的:那些聪慧而有好奇心的医生的确对自然有所讨论,并且认为通过对自然的研究而寻得他们知识的原则十分重要;同样对于出色的自然研究者而言,人们可以说他们以医学原则作为他们讨论的终点(*Resp.* 480b23-31)。

我们这里不必深究亚里士多德这段论述背后的理论背景<sup>46</sup>,但他对自然哲学与医学理论的区别和联系的看法对于我们理解二者的关系具有重要启发。因为他揭示了这两个领域方法上的连续性和核心主题的重叠。如果理解的这一点,就不奇怪看到,一方面亚里士多德写作了讨论健康、疾病以及青年老年等诸多医学/生理学主题的著作,另一方面,在医学文本中,人类的自然(human nature)和本原理论等哲学论题也是常见的话题。这种连续性不仅通过著名的Menon纸草也可以体现出来——因为柏拉图、Empedocles和其他一些医学作者在这一文本中被置于同一平面考察<sup>47</sup>。而这种结合在后古典时期的哲学和医学思想中则更为明显,我们不要忘记著名的怀疑论者Sextus Empiricus和柏拉图主义者Galen等都是医生(值得一提的还有Asclepiades of Bithyma, Menodotus),而甚至“经验主义”(Empiricism)和“方法论学派”(the Methodist School)这样耳熟能详的哲学术语也是来自医学传统。<sup>48</sup>

除了古代哲学概念的流动性,如上所述,当代哲学概念的拓展和变化也同样导致了当代的古代哲学研究的拓展和变化。这是古代哲学研究的内涵和关注点发生变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例如在新康德主义的巨大影响下,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知识论一度成为显学,而在

<sup>46</sup> 关于这一论题的研究参 van der Eijk (1995) 'Aristotle on "distinguished physicians" and on the medical significance of dreams', in *Ancient Medicine in its Socio-Cultural Context*, eds., by van der Eijk, H.F.J. Horstmanshoff and P.H. Schrijvers, Amsterdam - Atlanta: Rodopi, 447-459。

<sup>47</sup> 这一纸草也称为 *Anonymus Londinensis*, 最近的校勘本来自 Daniela Manetti 编辑, 于 2011 年在 Teubner 系列出版的校本, 参 Manetti, *Anonymus Londinensis: De Medicina*. Berlin: De Gruyter, 2011。值得参看校勘还包括 Diels 的编辑本以及 Jones 的注释本。

<sup>48</sup> 关于医学和哲学的互动, 值得参看的包括 Werner Jaeger, G.E.R. Lloyd, J. Jouanna, R.J. Hankinson, M. Frede, von Staden, P. van der Eijk 等人的研究。



海德格尔主义的影响下，神话、实践和技艺等概念则得到欧陆学界更多的关心。与之类似，英美战后早期的古代哲学往往集中于意义、语言和逻辑等早期分析哲学关心的领域，但由于当下分析哲学概念的拓展，英语学界的古代哲学研究也相应得到了全方位的拓展。这种拓展可以从共时和历时两个角度来说明。从共时层面看，大量过去被漠视的主题重新得到关注甚至成为研究的焦点。比如柏拉图的对话《菲勒布》（*Philebus*）早期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本体论与辩证法，而作为主题的快乐、痛苦和善很少得到关注。而近年的研究则完全反转过来，前者的研究屈指可数，后者的考察现在已经成为柏拉图研究，甚至古希腊哲学学术界最为活跃的话题之一。与之类似，亚里士多德不再被轻易地视为经验主义者或者常识哲学家，他的生物学与形而上学的关联<sup>49</sup>，他的实践推理概念，以及他的心灵或感知概念都是迄今最为热门的话题。从历时层面看，尽管古典时期始终是研究的中心，但其他时期，尤其是希腊化时期和晚期古代都开始得到不同程度的关注。这里并不是说这些时代在过去缺乏研究，而是说过去的研究往往以历史或文化研究为主导，哲学上相对贫弱。甚至哲学家主动将这一时期的思想视为缺乏原创的，折中主义的，而错失了严肃对待其内在理论价值的机会。与之相对，今天不少古代哲学研究者意识到，希腊化时期和晚期古代的哲学不仅对于理解早期现代哲学和古典哲学是重要的，而且他们自身——无论是论证而是论题，甚至做哲学的方式——**在哲学上都值得严肃对待**。这一趋势就大大拓展了古代哲学的视域，纠正了学界从前过于集中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两个巨人身上的狭隘<sup>50</sup>。

由于上文所提及的古代哲学研究在内容和方法上的变化，它也要求古代哲学研究者除了具有历史学家同样的敏感度之外，还需要尽量了解部分相关的**当代哲学**和**具体科学**。但需要注意，这一要求并不是说所有的古代哲学的论题都要以当代哲学标准来衡量，更不是古代哲学的研究要迎合的当代哲学的旨趣，遵循同样的方法；而是说，跟需要懂得语言，需要了解文献类似，对于当代哲学的一定掌握，与其他方法一起，会帮助你对于古代文本或思想形成反思性的平衡，从而服务于具体的研究目的。在今天的语境下，例如，一个完全不了解当代伦理学而能否胜任讨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完全不懂得当代心灵哲学能否胜任考察斯多亚的情感理论都是可疑的。而从更为宽泛的角度来说，概念分析和论证重构、适度的形式化以及清晰的表达有时是当代学术的**普泛性**需要，而不仅仅限于狭义的哲学学科。尽管需要承认，根据研究的对象与目标的不同，对于当代哲学的把握程度的要求有所差异，其作用也根

<sup>49</sup> 关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及其方法，可参新近的两本研究：Devin Henry and Karen Margrethe Nielson (eds.) (2015)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Aristotle's Science and Eth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arbowski, Joseph. (2019). *Aristotle's Method in Ethics: Philosophy in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up>50</sup> 关于这两个时期的古代哲学，有代表性的整体图景可以参 Algra, K., Barnes, J., Mansfeld, J., & Schofield, M. (Eds.). (1999).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Hellenistic Philoso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erson, L. (Ed.). (2000).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Philosophy in Late Antiqu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关于罗马帝国和晚期古代的哲学，也可以参看德语学界 2019 年出版的新 Ueberweg 哲学史的第五部分：Christoph Riedweg, Christoph Horn, Dietmar Wyrwa (ed.), *Philosophie der Kaiserzeit und der Spätantike. Grundriss d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Die Philosophie der Antike* 5/3. Basel: Schwabe Verlag, 2018。晚期古代哲学研究的兴起也与 R. Sorabji 主编的“古代亚里士多德注解”的英译项目出版密切相关（相关文献，参 [www.ancientcommentators.org.uk](http://www.ancientcommentators.org.uk)）。

据不同的论题发生着变化，但它对于大部分古代哲学研究的意义仍旧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它有时建构你的思考（比如你的研究是亚里士多德是不是一个伦理自然主义者），有时这是你思考的必要条件。即使对于这一面向最为漠然的学者（前文支持『非哲学的哲学史研究』的学者），对于当代哲学的一定了解也是与二手文献对话的必要条件。尤其值得一提的，甚至如果你仅仅具有好古的兴趣，仅仅关心还原所谓原初的作者意图，那么为了避免时代误置，更好方式无疑是认识当代哲学，而不是刻意回避或者漠视。

#### 4. 古代哲学的文献：史料与研究

正如之前所言，不同于考古学等主要依赖物质材料的学科，古代哲学是以文字材料为基础的一门学科。鉴于这一特征，这里我们就首先需要对古代哲学的文献有所了解。大体而言，我们可以将文献分为两类，一类叫做史料，也常常称为一手材料；另一类称为研究，也被视为二手材料。简单来说，前者就是古代哲学家的作品，后者就是后世学者对于这些作品的研究。然而，如果仔细考量，二者的区分和界限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明了。事实上，我们需要注意，一手文献与二手文献的概念实则具有某种相对性，它们的界限会由于研究目标的设定而变化。举一个例子，如果你以研究柏拉图的《斐多》这部作品的目的，那么新柏拉图主义者 Olympiodorus 的《〈斐多〉注》与其他注释一起可以视为二手文献，但如果你的目标是研究晚期的新柏拉图主义，那么《〈斐多〉注》无可避免的就视为一手文献。与之类似，如果你打算研究柏拉图在战后牛津哲学的接受史，那么牛津大学相关学者的作品自然成为一手材料，尽管一般而言，我们都是将它们作为二手材料来使用。

##### 4.1 版本（史料）

现在我们把重心放在古代的作者上。大部分情况下，他们的作品是古代哲学研究的一手材料。但正如上文已经提及的，由于古代的作品距离我们的年代较为遥远，并且有着独特的文献流传史，我们对它们的阅读和研究不同于近代哲学，更不要说当代哲学。古代哲学的史料，正如上文所言，首先由下面这个基本事实所决定：我们没有古代哲学家的手稿，而各种语言的中世纪抄本是我们史料的主要来源。这种情况使得文献重建的工作，在古代哲学那里，比现当代哲学更为困难和重要。

我们首先把目光先放在有相对完整作品传世的哲学家那里，比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普罗丁等。我们有较好的方式接近他们的作品，不仅因为他们的作品保存和流传情况较好<sup>51</sup>，同时当下的出版界提供了不同的版本和大量翻译供不同层次的读者选择，使得我们可以方便取得需要的文本。这里，我们先介绍几种常用的版本。无疑，对于古代哲学研究者而言，最重要的版本范畴就是所谓的校勘本（critical edition）。这里的『critical』并不是批判或者

<sup>51</sup> 与柏拉图等人不同，亚里士多德作品的保存和流传有着更多问题。同时，尽管他留存下的文本数量巨大，但是遗失的作品同样数量巨大，但这些暂时不是我们此处关心的问题。

鉴赏的含义,而是通过一套科学程序对于文本的历史进行重构,在此基础上对于抄本进行整理校勘,从而生成一个相对可靠的版本。这一文本以学术为首要目的:一方面它提供学术上可以引用的文本,另一方面则提供稿本流传、校勘和异文等信息<sup>52</sup>。关于校勘本如何制作、使用以及其背后的学术理念,大家可以参看 Martin West 等学者的导引<sup>53</sup>,这里不能详论。下文主要以哲学文本为例为初学者提供一个粗略的实用知识参考:

第一,校勘本是古代哲学研究者工作的基础,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它们是可以作为学术作品而引用的版本。尽管一般而言,最新的校勘本往往是我们工作的权威依据,但也不要迷信这一点。有时,古代哲学的研究者必须依赖好几个校勘本一同工作。有时候,在这些文本的基础上,你需要提出自己的读法或者重建可信的文本。

第二,大部分古代哲学作家的校勘本被收录进入三个非常著名的古希腊罗马文献系列,即英国的 OCT (Oxford Classical Texts),德国的 Teubner (Bibliotheca Teubneriana) 和法国的 Budé (Collection Budé),其中前两者仅仅附有导言和原始文本;后者还包括法译和繁简不一的注释。但在这三个文库之外,也有不少古代哲学家的作品在其他系列或者单独出版;同时,上面三个文库未必总是提供最优的版本:比如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我们更常用的是由 Kassel 编订,De Gruyter 出版社出版的单行本,而非 Ross 在 OCT 系列的版本<sup>54</sup>;而 Diogenes Laertius 最新的校勘版则由 Dorandi 在剑桥的 *Classical Texts and Commentaries* 系列出版<sup>55</sup>。

第三,校勘本的正文通常由三个部分组成,除了主体的文本,在边栏一般有行数和一些独特的边码(参图 3 右上角,你会看到 328d 这样的字样;而右册边栏的中间则是 329),而在主体文本下部则一般附有**校勘栏**(apparatus criticus;参图一下方小字),它的作用在于给出文本的异文、修订等信息,是所有专业的研究者不可或缺的助手<sup>56</sup>。有些校勘本还会罗列单独的 testimony 栏目,收录古代的相关证言,但这一部分有时会合并在校勘栏里,有时则会省略。例如 OCT 新版由 Slings 编订的《理想国》就整合了部分新柏拉图主义者相关解释和讨论,而这部分内容在 Burnet 编订的老版 OCT 中基本是没有收录的。

<sup>52</sup> 这里的讨论局限于传统形态的校勘本,也是绝大多数古代哲学史料出版的形态。它们并不适用于近现代哲学并非基于相同原则的校勘本,也不适用于新兴的多元文本(multitext)、开放文本或者数字校勘本(digital critical edition)等。

<sup>53</sup> 迄今最好的教材仍旧是 Martin L. West, *Textual Criticism and Editorial Technique Applicable to Greek and Latin Text*. Stuttgart: B.G. Teubner, 1973。之前的经典论述参 Paul Maas, *Textual Critic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2; 集中于拉丁文献的新近论述,参 Richard John Tarrant, *Texts, Editors, and Readers: Methods and Problems in Latin Textual Critic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古代文献校勘本所依据的核心方法——拉赫曼方法(Lachmann Method)——的学术史背景,可参 Sebastiano Timpanaro, *The Genesis of Lachmann's Method*, trans. by and Glenn W. Mos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sup>54</sup> Rudolf Kassel. *Aristotelis ars rhetorica*. Berlin: De Gruyter, 1976。

<sup>55</sup> Tiziano Dorandi, *Diogenes Laertius: 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OCT 和 Teubner 都有本书的老校勘本。

<sup>56</sup> 关于校勘栏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广为流传的轶事就是著名古典学家 Eduard Fraenkel 在学生时代阅读阿里斯托芬时没有参照校勘栏从而被导师 Friedrich Leo 取笑。这也彰显了是否阅读校勘栏称为学术阅读与业余阅读的分水岭。

第四, 校勘本实则包含不同类型, 其背后往往承载着不同的编辑理念和文化传统。前文所提及的 OCT、Teubner 和 Budé 就风格迥异。而具体到每一部作品, 不同的编辑又有自己的考量。这里我们不可能进入这一复杂的话题, 但粗略了解 *editio maior* (繁版) 和 *editio minor* (简版) 的区别还是有益的。简而言之, 前者通常提供尽量完整的版本和校勘信息, 而后者则通常以较为经济的方式给出校勘信息。这一区分的直观体现就是校勘栏所占篇幅的多少。Jaeger 当年立志做出《形而上学》的 *editio maior*, 但最终也仅仅完成 *editio minor*<sup>57</sup>。我们今天或许可以期待 Primavesi 和 Rashed 可能在将来完成这一文本的 *editio maior*<sup>58</sup>。不过我们也需要注意到, *editio maior* 和 *editio minor* 的区分是建立在形式上, 而与文本的质量并无关系。Paul Henry 与 Hans-Rudolf Schwyzer 编辑了两版柏拉图主义者的创始者 Plotinus, 而 *editio minor* 是相对更为被认可的一版。<sup>59</sup>

第五, 尽管校勘本是我们的主要引用依据, 但我们并不直接引用最新或最好的校勘本页码, 而是常常依据某一约定俗称的**标准码**, 它们通常会反映在边码处, 比如上文中提及的《理想国》328d, 就是柏拉图的 Stephanus 码, 而亚里士多德我们则使用 Bekker 码。由于古代作品对于引用精确性的要求, 大部分情况下, 我们还需要附上行数, 例如《形而上学》998a32 (Bekker 码分为 a 和 b 是因为其排版分为左右两栏, 32 则代表第 32 行)。

第六, 古代作者的引用不仅需要考虑版本和页码, 而且还需要考虑作家和作品的缩写。这不仅是我们写作学术论文, 也是我们阅读古代哲学研究作品的必要条件之一。比如当我们看到 Arist. *MA* 791a2 时, 我们需要知道这里指亚里士多德的《论动物运动》(*De Motu Animalium*), Bekker 版 791 页左边栏第 2 行。一般而言, 古代哲学常用的缩写追随两套系统, 其一是牛津大学出版社的 *A Greek-English Lexicon* (缩写为 LSJ), 这部词典提供了大部分古代作家作品的缩写; 另一部是同一出版社出版的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缩写为 OCD, 目前为第四版)。尽管它相比于前者称不上完备, 但也是有益的补充。尤其当 LSJ 提供的缩写过于简化时, 比如柏拉图的《理想国》根据拉丁语缩写为 R., OCD 提供的选项“Resp.”就更值得考虑 (类似, 上文的《论动物运动》, 这里缩写为 *De motu an.*)。当然这两部工具书并不能覆盖所有古代哲学作品的缩写, 例如上文提及的《论动物运动》也会有学者缩写为 *DMA*, 因此我们一方面要注意一些非主流, 但同样通行的缩写, 另一方面, 在必要的时候我们还要求助于其他专书。例如德语学界有时会优先 *Der Neue Pauly* 卷一的缩写提案, 而具体到某一作者, 比如医

<sup>57</sup> Werner Jaeger. *Aristotelis Metaphysica*. Oxford, 1957.

<sup>58</sup> 关于《形而上学》的文本问题, 可以参看 Primavesi 为卷一新校本撰写的引导, 载于 Carlos G. Steel, and Oliver Primavesi. *Aristotle's Metaphysics Alpha: Symposium Aristotelicu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387-464。同时值得参看: Kotwick, Mirjam E. *Alexander of Aphrodisias and the Text of Aristotle's Metaphysics*. Berkeley, California 2016; D. Harlfinger, "Zur Überlieferungsgeschichte der 'Metaphysik'", in P. Aubenque (ed.), *Études sur la Métaphysique d'Aristote*, Paris, pp. 7-36.

<sup>59</sup> Paul Henry and Hans-Rudolf Schwyzer (eds.), *Plotini Opera, editio maior* (3 volumes), Paris, Desclée de Brouwer, 1951-1973. Paul Henry and Hans-Rudolf Schwyzer (eds.), *Plotini Opera, editio minor*, Oxford, Oxford Classical Text, 1964-1982.

生和哲学家盖伦 (Galen) 的引用, 新近出版的 *Cambridge Companion to Galen* 提供的缩写文献表比上述综合类工具书则更为完善。

第七, 除了掌握古代语言之外, 在面对校勘本的时候, 我们还需要掌握在正文中常见的标点和编辑符号, 比如†表示编辑者认为不可修复的损毁, 比如<...>通常是编辑的添加, 而[...]则表示编辑对于稿本的删除等。同样, 为了看懂校勘栏, 你需要懂得校勘栏的缩写。例如大写的 A B C 通常表示重要的抄本, 而小写的 a b c 则代表相对次要的抄本, 而希腊文的  $\alpha \beta \gamma$  代表重构的原型 (archetype, 关于这个概念, 参 West 1973, 32 以下)。当然它们在某一文本中的具体指涉通常可以通过前言所附的缩写列表看到 (参图 2)。除此之外, 一些常用的拉丁文缩写也有必要掌握; 尤其与抄本的缩写不同, 这些内容通常不会被编辑列入文本的缩写表。例如 add. 即 addidit, 表示添加; 而 conj. , 即 coniecit 或 conieci, 表示某位学者或编辑本人的推测读法。关于这方面的知识, 你可以通过各种古典学教材手册或者网络上各种辅助材料 (比如 Karl Maurer 制作的表格) 获得<sup>60</sup>。

## SIGLA

B	Bodleianus Clark. 39	} familiae primae
T	Venetus App. Class. 4. 1	
W	Vindobonensis suppl. phil. gr. 7 (olim 54)	
F	Vindobonensis suppl. phil. gr. 39 (olim 55), familiae alterius	
B <sup>2</sup> T <sup>2</sup>	designantur manus διορθωτων	
b t	similibus designantur manus recentiores	
Nonnunquam citantur :		
P	Vaticanus Palatinus 173, familiae primae	} recensione Byzantinae
Par <sup>2</sup> , Par <sup>3</sup>	manus correctrices Parisini 1808 (Bekkeri B)	
Flor	Laurentianus 85. 6 (Stallbaumi b)	
V	Parisinus 2110	
Y	Vindobonensis phil. gr. 21	
fragmenta papyracea :		
II <sup>1</sup>	P. Rainer	
II <sup>2</sup>	P. Oxy. 454 et P.S.I. 119	
II <sup>3</sup>	P.S.I. 1200	
II <sup>4</sup>	P. Fouad I 2	
Olλ	Olympiodori lemmata	
Olπ	Olympiodori paraphrasis	

图 2: Dodds 编校的柏拉图《高尔吉亚》所附缩写表 (载于 Eric Robertson Dodds. 1959. *Plato: Gorgia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68)

<sup>60</sup> 例如 Riemer, Peter, Michael Weissenberger, and Bernhard Zimmermann (2016). *Einführung in das Studium der Gräzistik* (München Beck), 229-30.

## ΠΟΛΙΤΕΙΑΣ Α

328 d

πορεύεσθαι πρὸς τὸ ἄστυ, οὐδὲν ἂν σέ ἔδει δεῦρο ἰέναι, ἀλλ' d  
 ἡμεῖς ἂν παρὰ σέ ἦμεν· νῦν δέ σε χρὴ πυκνότερον δεῦρο ἰέναι.  
 ὡς εὖ ἴσθι ὅτι ἔμοιγε ὅσον αἱ ἄλλαι αἱ κατὰ τὸ σῶμα ἡδοναὶ  
 ἀπομαραίνονται, τοσοῦτον αὖξονται αἱ περὶ τοὺς λόγους  
 ἐπιθυμίαι τε καὶ ἡδοναί. μὴ οὖν ἄλλως ποίει, ἀλλὰ τοῖσδέ 5  
 τε τοῖς νεανίσκοις σύνισθι καὶ δεῦρο παρ' ἡμᾶς φοίτα ὡς παρὰ  
 φίλους τε καὶ πάνυ οἰκείους.

Καὶ μὴν, ἦν δ' ἐγώ, ὦ Κέφαλε, χαίρω γε διαλεγόμενος τοῖς  
 σφόδρα πρεσβύταις· δοκεῖ γάρ μοι χρήναι παρ' αὐτῶν e  
 πυνθάνεσθαι, ὥσπερ τιὰ ὁδὸν προεληλυθότων ἦν καὶ ἡμᾶς  
 ἴσως δεήσει πορεύεσθαι, ποία τίς ἐστίν, τραχεία καὶ χαλεπή,  
 ἢ ῥαδία καὶ εὐπορος. καὶ δὴ καὶ σοῦ ἡδέως ἂν πυθοίμην ὅτι  
 σοι φαίνεται τοῦτο, ἐπειδὴ ἐνταῦθα ἤδη εἰ τῆς ἡλικίας ὁ δὴ 5  
 ἐπὶ γήραος οὐδὲ φασιν εἶναι οἱ ποιηταί, πότερον  
 χαλεπὸν τοῦ βίου, ἢ πῶς σὺ αὐτὸ ἐξαγγέλλεις.

Ἐγὼ σοι, ἔφη, νῆ τὸν Δία ἐρῶ, ὦ Σώκρατες, οἷόν γέ μοι 329  
 φαίνεται. πολλάκις γὰρ συνερχόμεθά τινες εἰς ταῦτόν παρα-  
 πλησίαν ἡλικίαν ἔχοντες, διασώζοντες τὴν παλαιὰν παροι-  
 μίαν. οἱ οὖν πλείστοι ἡμῶν ὀλοφύρονται συνιόντες, τὰς ἐν τῇ  
 νεότητι ἡδονὰς ποθοῦντες καὶ ἀναμιμνησκόμενοι περὶ τε 5  
 τὰ φροδίσια καὶ περὶ πότους τε καὶ εὐωχίας καὶ ἄλλ' ἅττα ἅ-  
 τῶν τοιούτων ἔχεται, καὶ ἀγανακτοῦσιν ὡς μεγάλων τινῶν  
 ἀπεστερημένοι καὶ τότε μὲν εὖ ζῶντες, νῦν δὲ οὐδὲ ζῶντες.  
 ἔνιοι δὲ καὶ τὰς τῶν οἰκείων προπηλακίσεις τοῦ γήρωσ b  
 ὀδύρονται, καὶ ἐπὶ τούτῳ δὴ τὸ γήρας ὑμνοῦσιν ὅσων  
 κακῶν σφίσι αἴτιον. ἐμοὶ δὲ δοκοῦσιν, ὦ Σώκρατες, οὗτοι  
 οὐ τὸ αἴτιον αἰτιάσθαι. εἰ γὰρ ἦν τοῦτο αἴτιον, κἂν ἐγὼ τὰ  
 αὐτὰ ταῦτα ἐπεπόνθη, ἔνεκά γε γήρωσ, καὶ οἱ ἄλλοι πάντες 5  
 ὅσοι ἐνταῦθα ἦλθον ἡλικίας. νῦν δ' ἔγωγε ἤδη ἐντετύχηκα οὐχ

d3 ὅτι ἔμοιγε ὅσον AD Clem. Stob.: ὅσον ἔμοιγε F αἱ ἄλλαι ADF  
 Clem. Stob.: om. Anaximen.Lamps. d6 τε AD Stob. Thom.Mag.:  
 τι F νεανίσκοις DF Stob.: νεανίαις A Thom.Mag. ξύνισθι ADF Stob.:  
 ξύνισθι Thom.Mag. d8 γε D Stob.: τε F: om. A e3 ὅποια Stob.  
 e7 αὐτὸ ADF Stob.: αὐτὸς Asl 329a3 διασώζοντες ADF Stob.  
 Choric.: σωζοντες [sic] A<sup>3</sup> a6 τε καὶ DF Stob.: καὶ A b2 τοῦτο  
 Stob.

3

图 3: OCT 新版柏拉图《理想国》校勘本的第 3 页

说明: ΠΟΛΙΤΕΙΑΣ Α (Politeias A) 是标题和卷数, 表示《理想国》(直译《政制》)卷一本页开始于 Stephanus 码 328d1, 终于 329b6, 行数在右侧边。比如要引用中间的 ἐπὶ γήραος οὐδὲ, 那么按照 OCD 的系统, 则引为 *Resp.* 328e6。校勘栏 (apparatus criticus) 给出了从 328d3 到 329d2 之间的校勘信息。以 d3 为例, 我们看到文本采取了 A 抄本、D 抄本以及 Clement 和 Stobaeus 的读法, 为 ὅτι ἔμοιγε ὅσον, 而 F 抄本则读作 ὅσον ἔμοιγε。根据导言提供的缩写, 我们知道 A = Parisinus graecus 1807, D = Marcianus graecus 185, F = Vindobonensis suppl. gr. 39。再比如根据 d8 的信息, 我们知道, D 抄本和 Stobaeus 读为 γε, F 抄本读为 τε, 而 A 抄本则省略了本处。

校勘本之外的其他版本用途各异。他们有些提供原始文本，有些则附上译文（双语版），而更常见的是单纯的各种现代语言译本。不少非校勘本同样在古代哲学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只是它们的功用各有不同。就原文而言，其他版本与校勘本最大的不同就是它们或者完全没有前者标志性的校勘栏，或者仅以一种相当简化的方式保留了部分校勘信息（例如流行的 Loeb 丛书基本就属于这一类）。出版非校勘本的原文，有时是为初学者的提供基本的语言训练文本，或者是为并不关心繁复校勘信息的进阶者提供可读性较强的文本。比较而言，双语本最大的优势就是便于查对，无论是语言学习，还是为了研究。这一类出版物相当多元，除了著名的 Loeb 文库，还有德语区出版的 Tusculum 系列和 Meiner 出版社的哲学文库本等（后者有时也会直接采用校勘本的希腊文）。而古代哲学文本的单语译本就更为数目繁多了，尤其是像柏拉图这样普及度较高的哲学家，由于新译本层出不穷，几乎难以得到全面的概观。对于初学者而言，尤其重要的是选择值得信赖的译本。尽管这需要一部著作一步著作的具体对待，但通常知名出版社在学术系列或者大学教育系列出版的文本相对更为值得信赖<sup>61</sup>。

#### 4.2 版本（残篇）

上文我们所提及的例子主要限制在有相对完整传世作品的哲学家那里，但是在古代哲学领域，还有大批哲学家没有完整作品传世的，而他们也是古代哲学的重要构成部分。尤其在前苏格拉底哲学，希腊化时期哲学领域以及学园派或者漫步派的研究都大量需要与残缺的文本打交道。尽管我们上文对于各种版本和注释的划分在此处大体仍旧有效，但后一类作者的不同之处在于，由于缺乏完整的或者现成的作品，我们只能通过『残篇集』作品集来阅读和考察他们。在此最为著名的或许就是 Diels 和 Kranz 编的《前苏格拉底哲人残篇》（*Die Fragmente der Vorsokratiker*）了；同类的作品，我们还有 Usener 的《伊壁鸠鲁集》（*Epicurea*）和 Von Arnim 的《早期斯多亚残篇》等（参本节附录）。它们之所以被称为残篇集，是因为这些作者的作品未能完整地流传，我们往往通过辑佚，即依赖于其他作品的引用把这些文本汇集在一起。用更为学术的语言说，如果我们对于柏拉图对话录的了解依赖于『直接流传』（direct tradition）的话，对于后一类作者，我们则主要依赖于『间接流传』（indirect tradition）。然而首先要注意，笼统把这样的作品叫做『残篇』（fragments）其实并不准确。因为如果一些引用是某一遗失文本的一部分，它们的确是名副其实的残篇。但是，比如就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而言，他的格言集由多条简短并且相对独立的格言构成。对于这样的流传，笼统称之为残篇有误导的嫌疑（尽管赫拉克利特的全书的确没有流传下来）。当然更重要的是，很多记载并不是对于原文直接的引用（quotation），而是对于相关作者的报告（report）或批评，我们常称之为『证言』（testimony）。这里的困难之处在于，并不是所有时候（甚至

<sup>61</sup> 部分哲学家的作品，比如柏拉图或西塞罗等，由于其广泛的文学影响，通常也以世界文学名著的面目出版。但这类译本为了保留可读性或文学性，通常准确度不高，因此需要更为谨慎对待。这一情况不仅适用于中译本，也适用于其他现代语言译本。

经常), 『残篇』和『证言』未必能够得到清晰区分。不仅因为我们常常没有清晰无疑的标准来将具体的文本进行分类, 同时古人常常依据记忆的引用方式也加剧了困难。即使局限在证言内部, 我们需要注意, 证言与证言之间的价值并不一致, 有些作者意图在于准确复述作者的观点, 有些作者的记载则纯粹出于批判之心, 更有一些作者则是六经注我, 更有些则介于戏拟和发挥之间, 所以每一具体案例都不得不谨慎对待。

让我们还是以最为著名的『前苏格拉底哲人残篇』为例来简单说明一下这一类材料的使用。本书目前最为通行的版本为第六版, 由 Diels 编辑, 之后其学生 Kranz 修订并且增加了索引。根据这两位编者, 我们通常将这一文本缩写为 DK, 不过有时候 VS 也被使用(来自 Vorsokratiker), 尤其当你需要引用之前 Kranz 还没有介入的版本时(有些学者, 如 Schadewaldt, 偏好第一版; 而对于前苏的历史编纂学感兴趣的学者也需要研究不同版本之间的变化)。由于 DK 把作品分为残篇和证言两个部分, 所以通常的做法是引用前者使用缩写 B, 引用后者使用 A。所以当我们看到 DK 28 B5, 就可以知道这里引用的是巴门尼德(其在全书中编号为 28), 残篇 5。大体而言, 每一残篇集成都有自己的编辑方式与标准。但在 DK 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 不少残篇集的编订方式都与之大同小异。通常, 编辑会用 F(或 Fr.) 代表残篇, 而用 T 代表证言(Testimony)。不过正如上文所谓, 不少情况下, 其实残篇和证言并不容易截然区分, 有些学者甚至攻击这一区分背后的预设与实践意义<sup>62</sup>。随着学者们越来越意识到这一区分的困难, 并且同时越来越意识到所谓残篇的流传和接受语境的重要性, 新近出版的一些古代哲学残篇集成开始放弃 DK 所奠定的基本模式, 而采用了其他呈现方式。例如, 新近 Loeb 丛书的早期希腊哲学系列, 编辑 Laks 和 Most 将文本分为 P(生平=person), D(学说=doctrine), R(接受史=reception) 三个系统, 而采取不同的字体将“残篇”在其引用的语境下呈现。<sup>63</sup>

### 附录 1: 部分古希腊哲学常用的文本(包括残篇辑本和文丛)

DK 或 VS	Diels, H., and W. Kranz. <i>Die Fragmente der Vorsokratiker</i> . Berlin 1952 (前苏格拉底哲人残篇)
KRS	Kirk, G. S., Raven, J. E., and Schofield, M. <i>The Presocratic Philosophers</i> . 2nd edn. Cambridge 1983 (前苏格拉底哲人残篇选, 附有注解, 尤其适合教学)

<sup>62</sup> C. Osborne, *Rethinking Early Greek Philosophy: Hippolytus of Rome and the Presocratics* (London: Duckworth, 1987).

<sup>63</sup> Gemelli Marciano 于 2011 年在 Tusclum 系列出版的 *Vorsokratiker* 三卷已经采用了类似的编排方式。同样放弃了这一区分, 而更为强调文本的接受和效应的残篇集成, 还包括 De Gruyter 出版社的 *Traditio Praesocratica* 系列, 目前出版到 Xenophanes。



DG	Diels, H., <i>Doxographi Graeci</i> . Berlin 1879 (Diels 对于早期希腊哲学史料来源的重构与研究, 是其前苏格拉底哲人研究的基础)
SSR	Giannantoni, G., <i>Socratis et Socraticorum Reliquiae</i> . Naples 1990 (苏格拉底及其后学残篇与证言集成)
FHS&G	Fortenbaugh, W.W., P.M. Huby, R.W. Sharples, and D. Gutas, <i>Theophrastus of Eresus. Sources for His Life, Writings, Thought and Influence</i> , 2 vols., Leiden 1992 (亚里士多德的继承人 Theophrastus 的生平与著作集成, 附有多卷本详注)
Wehrli 或 SA	Wherli, F. <i>Die Schule des Aristoteles</i> , 10 vol. + 2 suppl., Basel/Stuttgart 1944-78 (亚里士多德学派后学的残篇和证言集成, 附有原文和注释, 部分内容被 Fortenbaugh 等主编的 <i>Rutgers University Studies in Classical Humanities</i> 所超越, 但整体仍旧不可替代)
LS	Long, A. A. and Sedley, D. N. (1987). <i>The Hellenistic Philosophers</i> . (2 vols.). Cambridge (希腊化时期学派代表文选, 附有简注, 类似于前苏领域的 KRS)
SVF	von Arnim, J.. <i>Stoicorum Veterum Fragmenta</i> . 3 vols. Leipzig. 1903-24 (早期斯多亚派残篇与证言文集, 尽管问题多多, 但迄今不可替代)
CMG	<i>Corpus Medicorum Graecorum</i> . 62 vol. Berlin. 1907-2010 (柏林科学院主编的希腊医学集成, 校勘本加现代语言译本, 并且附有注释, 不少文本与哲学紧密相关, 特别是身体、心灵和健康等主题, 时间跨度从公元前 5 世纪到拜占庭早期)
CAG	<i>Commentaria in Aristotelem Graeca</i> . 23 vol. 1882-1909 (柏林科学院主编的古代亚里士多德注本, 现有由 Sorabji 主编正在出版中的英译本)

最后, 值得一提, 由于电子资源和数据库的发展, 阅读古代哲学也有大量电子资源可以依赖。从原始文献的角度看, 这里值得提及的包括 Perseus, TLG 和 Loeb 全文数据库。在提供原文之外, 前两者还提供在线词典与词形分析等基本服务。但相对而言, TLG 通常选择的底本较好, 同时索引功能也更为强大, 所以对于研究型的读者更为适用。不过 TLG 的缺陷在于需要购买, 如果不在研究机构的读者(或者所在研究机构没有购买的读者)只能依赖于硬盘数据包加 Diogenes 阅读器来使用 TLG。这一组合能够实现 TLG 在线版的绝大部分功能, 虽然无法享受网络版文本的升级和其他统计服务。而与之不同, Perseus 不少文本都提供对照性的英译(不过通常译本较老), 同时附有 Smyth 以及 Kühner/Gerth 等语法书的在线版, 对于学习语言或者解决语法相关的问题十分实用。Loeb 的电子版同样需要付费, 它提供了中英对照版的文本, 并且可以全文索引和复制, 也是十分便捷。但需要注意, 这些数据库目前并不能完全取代权威的校勘本, 一方面我们无法获知充分的校勘栏信息, 另一方面文本录入也不总是毫无错误, 所以在严格的学术使用中, 我们通常需要将它们与权威的校勘本仔细核对。

### 4.3 注释

注释本介于史料和二手研究之间，它们在当代哲学中较为罕见，但既是古代哲学研究的重要形式之一，也对于古代哲学的学习和研究不可或缺。注释本的形态多种多样，它们有时候附带原文（无论是否以校勘本的形态），有时则仅提供译文。尽管同时提供原文和翻译的注释本十分常见，但既没有原文也没有翻译的注释本也间或可以碰到。但无论以何种形态出版，我们需要知道不同的注释服务于不同的目的，我们要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合适的注本。这里我们忽略需要单独成文介绍的古代/中世纪注释，而仅仅关注现当代的主流注释本。大体而言，我们可以把注释分为学习类和研究类两种，前者主要是为本科生或者研究生书写的注释（德语传统上叫做 *Schulkommentar*，其读者群体也包括人文中学的中学生，Ameis/Hentze/Cauer 撰写的《伊利亚特》注解是其代表），这一类作品有些以语言为主导，仅仅关注词汇、语法或粗浅的文化背景（例如基本仅仅关注语言和语法的 *Bryn Mawr Commentaries* 系列和德语区的 *Aschendorffs* 注释系列）；另一些则提供一定的语言帮助，但并不忽略学术方面的讨论，尽管往往点到为止（这里最为知名的是剑桥大学出版社 *Cambridge Greek and Latin Classics* 系列，其希腊文系列由于经典的黄绿皮封面，也常简称为黄绿皮系列）。另一种是学术性的注释，通常是写给研究者的，当然进阶阶段的学生一般也需要参考。就古代哲学而言，这一类注释又可以分为大概两种：其一是比较关注历史-语文学的，比如 Dodds 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高尔基亚》（*Gorgias*）或者 Marcovich 写作的《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sup>64</sup>；另一种则以哲学概念和论证的分析为主导，这一类以 *Clarendon Aristotle Series* 为代表。这一系列由牛津哲学家 Austin 创立，Ackrill 接续，其原初目标就是将亚里士多德介绍给哲学家，甚至是未必通达希腊语的哲学家。当然这两类的分别也不是绝对的，也有一些注解试图兼而有之，比如 Ebert 注释的《斐多》（*Phaidon*），Bluck 注释的《美诺》（*Meno*）等<sup>65</sup>。此外，还值得注意，古代哲学的注本有些是采取逐段或逐句注解的方式（例如 Shields 注解的亚里士多德《论灵魂》），也有部分是采取诸章讲解的方式（例如 Ebert 的《斐多》）。后者有时会接近一本专著，通常有着较高的统一性。但总而言之，每本注释的特点跟写作者的特征，跟设定的目标读者以及作品本身的性质都有关联。这因此，读者需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何时的注解，否则可能会事倍功半。

尽管这里我们并不谈论值得作为独立话题讨论的古代/中世纪注释，但在结束这个话题前，我认为值得略微提及一个相关话题，以帮助初学者回避可能的学习误区。即，当我们面对各种繁多的注释时，是否越古老的注释就越权威，因此更值得研习呢？人们可能会有这样的倾向，是因为有人会认为古人去古未远，掌握更多的材料，甚至与被注释的哲学家掌握同样的语言，自然比当代的学者更懂得被注释的哲学家或者文本。还有些更有经验的读者，他

<sup>64</sup> M. Marcovich (1967/2001), *The Fragments of Heraclitus. Greek text with a short commentary*. Academia Verlag.

<sup>65</sup> Ebert 2004, T.: *Platon. Phaidon*, Göttingen; Bluck (1961), *Plato. Meno*, Cambridge.

们倾向于认为老派的注释往往优于当下的注释，比如 19 世纪的一些注本，因为当时学者的古典语言水平是普遍高于当下学者的。这里，笔者当然无意于否认古人注释多方面的优势和重要价值，无论是从语言和内容，还是从掌握材料的角度。但即使这些作为事实完全成立，也并不能推出古注更值得阅读或者更具有权威性的结论。原因也很简单，首先，并不是任何情况下，古人都比我们掌握更多的材料，尤其我们要考虑到今天文献的传播和获取远远比古代便捷。其次，古人写作注释的目的和预设——例如有些作为备忘录，服务于本学派学生；有些为了维护学派正统，排斥异端——往往不同于当代学者，因此有时并不直接适应当代读者的期待和习惯。再者，古注就跟古代哲学的原始文献类似，同样离今天比较遥远，于是它们通常自身就额外附着理解的难度，有时需要**注释的注释**来提供帮助（Sorabji 编辑的“亚里士多德古注”系列往往附有相当长度的尾注来解释这一注本）。最后，也是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关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古代注释绝大部分来源于新柏拉图主义者，而他们对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理解有着自身独特的理论框架<sup>66</sup>。这种强烈的理论预设有时会遮蔽而不是澄清问题，甚至常常会误导缺乏相关背景的读者。因此古代的注释，总体而言，更适合有经验的读者，也即研究的进阶者，或者留给纯粹对古代注释本身感兴趣的读者；而古代哲学的初学者需要对之保持谨慎。

与之类似，我认为我们对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期的注本也要保持一定的谨慎，当然是出于不同的理由。由于这些注本都是古典研究被纳入学院教育和科学研究之后的产物，在形式和内容上，它们与当下流行的注本已经差别不大，其中一些对于今天的研究仍旧非常有用。比如 Hicks 注亚里士多德的《论灵魂》或者 Ross 注释的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等。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注本大多假设了读者高水平的希腊语，因此一些我们今天会希望得到解释的语法现象可能不会被关注，而大部分引用和原文都不会翻译，因此对于初学者也有更大阅读难度（前文提及以中学生作为主要读者群体的 *Schulkommentar* 如今可能适合的是古典方向的本科生，甚至研究生）。其次，当时的注本绝大多数由古典学家写就，对于更为关心哲学维度的读者而言，可能相关方面的信息相对匮乏。甚至仅仅就古典学术内部而言，一些注释或者由于方法论的过时（过度追求以传记解释学说变化，过度以史源考证或文本生成为重心等），或者由于当时资料的不完整或学术界的发展，它们所提供的信息从今天来看已经不再适用（例如 Burnet 对《斐多》中“苏格拉底自传”的分析）。最后，从十九世纪到当代，无论是哲学研究还是哲学史研究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自然也反应在古代哲学研究的方方面面。只要略微查对，那么读者会发现，尽管面对同样的文本，不少我们关心的问题，尤其是理论问题，可能相对古旧的注释并不会提及。所以泛泛而谈过去的黄金时代，不过是一个神话，对于切实的推进理解和研究意义不大。而尤其对于初学者，一般而言，从较

<sup>66</sup> 古代注释的入门可以参看 M. Tuominen 2009, *The Ancient Commentators on Plato and Aristotle*, Berkeley,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以及 Sorabji 为 *Aristotle Transformed: The Ancient Commentators and their Influence* (London: Duckworth 1990; 2016 Bloomsbury 第二版) 和 *Aristotle Re-interpreted: New Findings on Seven Hundred Years of the Ancient Commentators* (London: Bloomsbury) 写作的导言。

为晚近而权威的注释开始自己的研究是较为稳妥的入门方式；而较为古旧的注释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考虑是否进阶后有必要纳入阅读。

#### 4.4 研究文献

在概览了原始文献之后，让我们下来进入研究文献。上文关于注解的论述其实已经介入到研究文献的领域，因此我们将主要集中于其他类型的研究文献，以及我们如何获取和阅读研究文献。总体而言，研究文献大概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参考资源或者叫工具书（未必总是以书的形态出现），它包括辞典、字典、手册、百科全书、文献目录，索引、数据库等；第二类是文章，它又可以分为至少三类：期刊论文（journal article）、文集论文（article in edited volumes/ book chapter）以及书评（review）；第三类就是研究论著：大体可以分为专著（monograph）、会议论文集（conference proceedings）、学者论文集（kleine Schriften）、致敬文集（Festschrift）等。即使局限在狭义的古哲学内部，本文也不可能列举和分别介绍所有的文献类别，因此我将限于简单解释和列举部分重要的类别，并且借此介绍部分较为常用的文献。

##### 4.4.1 参考资源

首先让我们集中在参考资源上。我们将简介其中的两类：一类是概览导引类，可以给予某一主题快速的介绍，让读者迅速了解相关内容；另一类是目录类，即提供某一作者、主题或者关键词的研究文献列表，以便读者进一步进入研究或者深入阅读。当然，这两类文献有时候是结合或者部分重合的，因为不少导引性作品包含或长或短的研究文献，有些目录性的作品则包含摘要甚至同类作品的概览。

古代哲学的**概览性作品**，如果感兴趣短小精悍的导论，则可以参考 Christopher Shields 写作的 *Ancient Philosophy: A Contemporary Introduction* 和他主编 *Blackwell Guide to Ancient Philosophy*（两书均有中译）<sup>67</sup>或 Anthony Kenny 写作的 *A New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卷一（有中译）<sup>68</sup>；J. Brunschwig 和 G. E. R. Lloyd 主编的 *Greek Thought: A Guide to Classical Knowledge* 则更多体现了法语区古代哲学研究的观点<sup>69</sup>。在众多的概论之外，古代哲学的通史类著作则有两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分别是 Zeller 的 *Die Philosophie der Griechen in ihrer geschichtlichen Entwicklung*（《历史发展中的希腊哲学》）六卷本（1921 年修订版）和 Guthrie 的 *A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一部希腊哲学史》）六卷本。在这两部影响深远的通史之外，意大利学者 Reale 的 *Storia della filosofia antica*（《古代哲学史》）五卷本（Milan 1975，有英译本<sup>70</sup>）也有一定影响。当然，需要注意，这三部作品深深刻上了作者个人哲学立场的烙印，加上出版时间较早并且卷帙繁多，

<sup>67</sup> Christopher Shields, *Blackwell Guide to Ancient Philosophy* (Malden, MA: Blackwell, 2002)。

<sup>68</sup> 类似的简史类作品还包括 Zeller 的《古希腊哲学史纲》，但本书略微老旧。

<sup>69</sup> 原书为 *Le Savoir Grec: Dictionnaire Critique*。

<sup>70</sup> G. Reale, *A History of Ancient Philosophy*, Albany, New York: SUNY Press, 1985-90。

通读可能会让人望而生畏（相对而言，Guthrie 对于当代读者更为友好一些）。与之相对，瑞士 Schwabe 出版社多人撰写，2019 年才出版齐全的多卷本新 Ueberweg 哲学史古代部分，提供的信息更为严谨客观，尤其文献收录较为完备，适合作为工具书翻检查阅<sup>71</sup>。在这些通论通史之外，近年不少出版社在 *Cambridge Companions* 系列的成功之后，推出了类似的系列（包含 *Oxford Handbooks*, *Brill Companions*, *Blackwell Companions*, *Routledge Companions*, *Bloomsbury Companions* 等）<sup>72</sup>，其中除了古代哲学作为整体的通论<sup>73</sup>，也涵盖各种专题，既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哲学家或经典作品（例如《理想国》《尼各马可伦理学》《诗学》等）<sup>74</sup>，也包含斯多亚、伊壁鸠鲁派等学派或怀疑论这样专题，甚至古代哲学的接受史。这类书籍可以作为快速入门某一相关的导论使用<sup>75</sup>。当然，也需要注意，虽然这类书籍近年出版迅猛，文集的文章质量实则良莠不一。

除了古代哲学专门的**工具书**之外，古典学类和哲学类，甚至其他领域的工具书对于古代哲学研究者而言同样可能给予很多帮助。就古典学综合类工具书而言，*Der Neue Pauly*（英文译本为 *Brill New Pauly*）较容易获得，特别是如果购买了电子版版权（<https://referenceworks.brillonline.com/browse/brill-s-new-pauly>）<sup>76</sup>。当然更为全面的 *Pauly*<sup>77</sup> 和相对规模较小的 *OCD*（前引）也不可或缺。只是前者卷帙浩瀚，编排繁琐，使用并不方便，更适用于进阶的研究者，而后者则对初学者较为友好。除了综合性的工具书，如果关注概念史，那么 *Das Reallexikon für Antike und Christentum*（《古代与基督教实科辞典》）以及 *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哲学历史辞典》）这两部书也能提供不少帮助，当然更专业的研究还需要查找其他专著或者论文<sup>78</sup>。如果关心哲学家，那么 *Dictionnaire des philosophes antiques*（《古代哲学家辞典》）则是最佳的选择。值得一提，在线的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缩写

<sup>71</sup> *Die Philosophie der Antike* 包括 1. *Frühgriechische Philosophie*. Herausgeber: Dieter Bremer, Hellmut Flashar, Georg Rechenauer. 2 Halbbände; 2/1. *Sophistik. Sokrates. Sokratik. Mathematik. Medizin*. Herausgeber: Hellmut Flashar. 1998; 2/2. *Platon*. Autor: Michael Erler. 2007; 3. *Ältere Akademie. Aristoteles, Peripatos*. Herausgeber: Hellmut Flashar. 1983. – 2., durchgesehene und ergänzte Auflage, 2004; 4. *Die hellenistische Philosophie*. Herausgeber: Hellmut Flashar, Michael Erler. 2 Halbbände. 1994 – 2; 5. *Die Philosophie der Kaiserzeit und der Spätantike*. Herausgeber: Christoph Riedweg, Christoph Horn, Dietmar Wyrwa.

<sup>72</sup> 这一类丛书虽然实用，但系列与系列之间，文章与文章之间实则风格水平参差不齐，使用时也需要谨慎对待，这里无法专题论述。

<sup>73</sup> Mary Louise Gill and Pierre Pellegrin, *A Companion to Ancient Greek Philosophy* (Oxford: Blackwell, 2009).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Greek and Roman Philosoph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 Press, 2003).

<sup>74</sup> 德语区有 J.B. Metzler 出版社出版的 *Platon-Handbuch: Leben – Werk – Wirkung* 以及 *Aristoteles-Handbuch: Leben – Werk – Wirkung* 同样值得推荐。

<sup>75</sup> 其中 Brill's Companions to Classical Reception 系列用心于接受史，即包括对于古代哲学家的古代接受（例如 Brill's Companion to the Reception of Plato in Antiquity; Brill's Companion to the Reception of Aristotle in Antiquity），也包括其现当代接受，例如 Brill's Companion to the Classics, Fascist Italy and Nazi Germany 一书就十分方便查询当时柏拉图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解读。

<sup>76</sup> 其正刊和接受史部分已经出版完成，而增补卷正在出版中，像年表、地图、古代作品目录、古典学家辞典等主题卷都值得古代哲学研究者参考。

<sup>77</sup> *Pauly* 是迄今最大规模的古典学百科全书，参 Konrat Ziegler (Hrsg.): *Pauly's Real-Encyclopädie der classischen Altertumswissenschaft*. Neubearbeitung, begonnen von Georg Wissowa, fortgeführt von Wilhelm Groll und Karl Mittelhaus. Stuttgart 1894–1963 (1. Reihe I–XXIX), 1914–1972 (2. Reihe I–X) und 1912–1978 (Supplementbände), Register von Hans Gärtner und Albert Wünsch, München 1980.

<sup>78</sup> 值得关注的工具书还包括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以及杂志 *Archiv für Begriffsgeschichte*。

为 SEP) 和 *Internet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缩写为 IEP) 也提供了不少古代哲学相关的条目, 很值得参考。与上述古典学方面的工具书不同, 这两部作品更多地优势在于提供更多的哲学论述, 后者尤其适用于本科程度的读者<sup>79</sup>。不过需要注意, 尽管 IEP 也拥有高质量的词条, 但综合而言其, 质量相对于 SEP 更为参差不齐。

**研究目录**我们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获得, 除了上文提及书籍多附有参考文献或推荐书目外, 还有不少专门的目录供我们使用。这里主要推荐三种各具特色的综合性目录。其一是 *L'Année philologique*, 由 Société Internationale de Bibliographie Classique 出版, 提供 1928 年以来的古典学几乎所有领域的文献, 也是最全的古希腊罗马研究文献的在线目录, 可惜其在线版并不能免费使用 (<http://cpps.brepolis.net/aph/search.cfm>)。这一目录的特色在于全面, 并且专著下收集了相应的书评, 部分论文附有摘要。如果你想收集尽可能完备的研究文献, *L'Année philologique* 常常不可或缺 (当然它并没有穷尽一切文献, 常常你还需要自己通过其他方式补充被遗漏的研究); 尤其对于偏僻主题的论文, 它有着比其他数据库更大的帮助; 同时, 数据库还提供了较为完备的古典学杂志缩写, 不少出版社或者杂志都采用其缩写提案。当然这一数据库也有不少缺点, 除了分类有时缺乏准确之外, 文献收入的速度也较慢 (现在基本在 2019 年徘徊, 记录时间是 2021 年), 并且分类错误情况也并不少见。另一个研究文献数据库是 *Philpapers* (<https://philpapers.org>), 尽管成立时间较短, 但由于它的免费和开放性, 可以说已经取代需要付费的 *Philosophers' Index* 称为最为流行和全面的哲学文献目录索引 (当然它也有其他很多功能)。*Philpapers* 除了数据量庞大之外, 它兼具浏览和检索的双重功能。古代哲学方面即可以根据时间、主题等分类浏览各个分支 (比如“Ancient Greek and Roman Philosophy”, “Aristotle”, “Aristotle: Soul”就是不断递进, 可供分别浏览的层次), 也可以按照各种参数检索需要的文章。由于数据库的开放性, 作者可以直接编辑作品的信息, 因此在这里可以得到不少新近文献甚至尚未出版文件的信息, 不少文章会直接给出草稿或者出版版本的链接。近年集成在同一数据库下的 *Philpeople* 可以让你设定自己的主页并且追随感兴趣的学者, 随时了解他们最新研究<sup>80</sup>。当然这种开放性也使得这一数据库信息错误较多, 同时尤其是近年的文献比较鱼龙混杂, 但较老的非英语文献也有不少遗漏。第三个值得推荐的目录数据库部分避免上述两个数据库信息缺乏拣选的缺陷, 即 *Oxford Bibliographies* (<https://www.oxfordbibliographies.com>)。这一目录是按照主题分别邀请相关学者撰写, 每一主题都有比较合理的分类和简介, 因此非常适合浏览和阅读, 并且以此作为相关主题入门供研讨课或者自学使用。当然这一目录对于写作研究论文而言用处有限, 因为它相对比较集

<sup>79</sup> 古希腊罗马哲学也有少量单册综合性的辞书, 但它们提供的词条比起文本提及几种参考书相比, 通常过于简洁, 因此用处十分有限, 可以参 Donald J. Zeyl, *Encyclopedia of Classical Philosophy* (Westport, CT: Greenwood, 1997); Anthony Preus, *The A to Z of Ancient Greek Philosophy* (Lanham, MD: Scarecrow, 2010). Christoph Horn and Christof Rapp, *Wörterbuch der Antiken Philosophie* (München: Beck, 2002).

<sup>80</sup> 任何学问都要了解自己的同行, 也就是你的职业共同体。由于本文主要针对初步进入古代哲学领域的研习者, 因此我们的关注点更在于如何作为读者获得信息, 而非同时作为内容的贡献者如何参与到学术讨论。关于后一问题, 或许值得在别处单独讨论。

中在重要的英语文献上, 同时主题覆盖范围也称不上全面。此外, 它也需要付费才能使用。当然除了这些综合数据库, 古代哲学还有不少专门目录值得我们关注, 有些是以书籍的形式出版, 有些则是在线的形式, 比如“国际柏拉图协会”(International Plato Society) 每年会发布在线的柏拉图研究文献目录 <https://platosociety.org/plato-bibliography/>, 而 academeia 和 researchgate 等平台上也有不少学者发布各种主题的研究目录。总之, 我们需要记住, 没有一个目录数据库可以穷尽所有文献或满足所有需要, 因此我们需要了解不同的数据库, 了解多种多样获取目录的方式, 然后对于各种目录善加利用, 并且逐渐构建自己的数据库(这方面的工作同时可以利用 Zotero, EndNote 或者 Citavi 等软件的协助完成)。

对于概览性地了解某一学术领域而言, 除了通论、概论、目录等工具之外, 十分重要的还包括**书评**, 它尤其对于快速把握学界前沿十分有益。而写作书评, 往往也是新人进入学界较为方便的途径。就古代哲学而言, 除了专业的古代哲学杂志常常发布本领域的相关书评之外, 需要注意, 哲学杂志和古典学杂志一般也都会发表相关书评。尤其在线的 *Bryn Mawr Classical Review* ( <http://bmcr.brynmawr.edu> ) 和 *Notre Dame Philosophical Reviews* ( <https://ndpr.nd.edu/recent-reviews> ) 都会有大量古代哲学书籍的评论, 并且他们相较于其他刊物一般发表都更为及时, 值得订阅随时关注更新。而 *Phronesis*、*The Classical Review*、*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Gnomon*、*Philosophical Review* 等刊物的古代哲学方面的评论都十分丰富。有些刊物——例如 *Oxford Studies of Ancient Philosophy*——会不定期的发表“书评论文”(review article) 或者“讨论”(discussion/ book symposium), 这两类评论通常比一般的书评更为详细和犀利。还有一些刊物, 比如 *Phronesis*, 它们的书评一般不是集中于某本书, 而是会采取同一主题下多种作品同时评议的方式, 近似于新近某一主题的研究进展综述。

#### 4.4.2 论文与专著

在讨论完参考资源和书评后, 我们就进入到对于我们研究而言更为实质性的部分, 也就是论文和其他书籍, 这其中最重要的恐怕就是期刊论文和专著了。尽管时下在哲学界常有二者谁更为重要的争议, 但抽象地对比这两种不同的类型的研究实则意义有限, 它们的重要性与否更多地由研究本身质量的高低以及研究主题所决定。这里我们不如将注意力放到这两种研究类型在形式、写作和出版上的差异, 从而能够更为方便有效地为我所用, 既作为读者, 也作为未来潜在的作者。

研究论文的类型多种多样, 它们可以发表在各种媒介上, 最为常见的是期刊和会议文集。就传统而言, 学者很少考虑文章发表在何种媒介之上; 尤其八十年代之前, 很多重要研究都发表在致敬文集 (Festschrift) 和会议论文集上。而最近二三十年, 由于高校考核机制的改变以及出版和资讯的泛滥, 加上期刊的自我调整等多种因素, 论文发表的重心开始向期刊, 尤其是声誉较高的期刊倾斜。这里部分的原因也在于, 相比于其他出版形式, 期刊通常采取了较为严格的同行评议机制 (peer review), 双盲评审成了大部分顶级期刊的标配, 近年部分

期刊采取了更为严格的三盲机制（这里增加的维度是在决定是否录用前，杂志编辑也不再知道作者的身份），以更好地避免出于人情或者声誉导致的发表。尽管这方面的问题并非完全能够通过完善制度来克服，甚至同行评议又带来其他的一些学术问题（例如保守化的趋势），但目前哲学界，包括古代哲学研究界，并没有其他更好的替代性方案。根据正在进行的讨论，部分采取预印本模式，公开评审记录以及更多的开源（open access）刊物或许是未来的变革方向（根据汉语学界第一个开源三盲评审的杂志《哲学评鉴》的说法，它们也会收录古希腊罗马哲学方面的论文）。

由于期刊愈发突显的重要性，古代哲学的研究者当然有必要对之有一个概览。我们一般关注三类期刊：1. 古代哲学专题期刊；2. 综合哲学类以及哲学史期刊；3. 古典学类期刊<sup>81</sup>。

二战前并没有专门的古代哲学刊物，大部分古代哲学的论文都在古典学或哲学史的刊物上发表。而 1955 年创刊的 *Phronesis* 改变了这一局面，这本刊物也是迄今古代哲学最为权威的刊物之一。而 1983 年由 Julia Annas 创刊的 *Oxford Studies in Ancient Philosophy* 扭转了 *Phronesis* 一家独大的情景，从而这两本刊物通常被视为古代哲学学界最具有代表性的杂志。尽管都发表高质量的文章，但这两部杂志的风格还是略有差异，前者采取严格的双盲匿名评议，相对较为兼容并蓄，发表各种风格的古代哲学论文，也接受多种文字投稿（尽管英文在近年仍旧是主流）。而后者仍由主编引导，仅仅接受英语稿件，研究以战后的 Oxbridge 风格为主导。前者仍旧是传统期刊，一年发表四期，每期 2-4 篇论文；后者每期都有独立 ISBN 号，类似于汉语学界的以书代刊的辑刊，有时还会发行致敬文集等特刊。尤其值得注意，后者对于发表篇幅限制较松（可达上百页），不少长篇论文发表在后者。除了这两部刊物之外，古代哲学刊物中较有声誉的还有成立于 1966 年的 *Apeiron*，与上两部刊物不同，*Apeiron* 除了发表古代哲学方面的论文，也发表古代科学史和二者在接受史方面的论文。相比于前两部杂志，*Apeiron* 早期的发表更为良莠不齐，但近期在彻底调换了出版社和调整编委之后<sup>82</sup>，发表文章质量日趋稳定，不过每期文章的数量也相比于从前也有所下降。

如果说上面的三个刊物可以视为古代哲学三个最为主要的期刊，以下刊物古代哲学的研究者也不可错过，例如 *Ancient Philosophy*, *Proceedings of the Boston Area Colloquium in Ancient Philosophy*, *Elenchos*, *Méthexis*, *Philosophie Antique*, *Rhizomata*<sup>83</sup>, *Revue de Philosophie Ancienne*。它们都是古代哲学的综合类刊物。而 *Bochumer Philosophisches Jahrbuch für Antike und Mittelalter* 以及 *Dionysius* 同时也会关注中世纪哲学或者教父哲学，后者有比较多的新柏拉图主义方面的文章。2018 爱丁堡大学出版社创刊了 *Ancient Philosophy Today*，这一期刊以古代哲学和当代哲学的关联对话为特色，也颇为值得关注。汉语学界目前上没有古代哲学为主题的杂志，近年出版了两部集刊《古希

<sup>81</sup> 除了上文的三大板块，一些交叉领域也会出现古代哲学的论文，比如关注科学史的 *Isis*，关注医学史的 *Early Medicine and Science*，关注思想史的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等，但这里就不详论这一主题。

<sup>82</sup> *Apeiron* 的出版社由加拿大的 Academic Printing & Publishing 转入德国的 De Gruyter，现任主编为 Christian Wildberg 和 Benjamin Morison。

<sup>83</sup> 这份杂志的前身是 *Rhizai: A Journal for Ancient Philosophy and Science*，是 2004 年创刊，在东欧出版的古代哲学刊物。在 2011-12 年停刊两年后，重组并入 De Gruyter 出版社，改名为 *Rhizomata*。



《希腊罗马哲学研究》（2016年创刊）和《努斯：希腊罗马哲学研究》（2020创刊），前者发表原创性的论文和书评，后者混合了原创论文和西方学者论文的翻译。在上面的期刊之外，还有部分细分主题的古哲学刊物我们有时需要查阅：以柏拉图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 *Plato Journal* 是 International Plato Society 组稿的在线开源刊物；*Cronache Erolonesi* 则是获取 Herculaneum 纸草研究不可或缺的材料，其中贡献了大量伊壁鸠鲁派相关的文献。与之类似，Brill 出版社有以柏拉图传统为核心的刊物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Platonic Tradition*，而 *Polis* 则是同一出版社名下的古代政治哲学与思想史刊物。

综合类的哲学或哲学史类刊物同样是古代哲学发表的重镇，但并不是所有哲学刊物都会发表古代哲学。而在发表这一方向的哲学刊物之中，每一部刊物的发表频率、风格和权重也并非一致，这一点尤其值得研究者注意。常常发表古代哲学的哲学史刊物包括 *Archiv fü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和 *History of Philosophy Quarterly*；而综合性的刊物则包含 *Mind*，*Philosophical Review*，*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Philosopher's Imprint*，*Synthese*，*Review of Metaphysics* 以及新近增加的古代中世纪哲学栏目的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等。不过需要注意，综合类刊物的古代哲学发表频率一般远少于哲学史刊物，而有些哲学史刊物专攻早期近代或者近代哲学等，因此也较少收录古代哲学方向的稿件。

古代哲学另一个重要的发表板块是古典学的综合期刊，与哲学类似，由于传统和杂志不同的目标设定，并不是所有的综合类古典学刊物都可以找到哲学类的研究。同样，曾经发表比较多古代哲学文章的杂志，可能现在很少触碰这个领域（比如 *Hermes*）。这里没有空间详细讲述这些杂志之间的区别和变化，仅仅罗列部分一般会有古代哲学方面文章发表的杂志，例如 *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The Classical Quarterly*，*Classical Philology*，*Philologus*，*TAPA*（原名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Mnemosyne*，*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Rheinisches Museum für Philologie*，*Hermathena* 等。一些古典学的杂志会发表短论（一般名为 Notes, Short Notes, *Miszellen* 等），通常是以精炼的篇幅讨论文本校勘或其他细节问题，比如『《尼各马可伦理学》1152a20 的文本异读』『《斐多》90a2 的损毁问题』等都是典型的标题。这一类讨论不太会以独立的形态在其他类型的杂志中出现，因此是古典学刊物中我们尤其需要关注的栏目。

正如之前所谓，在杂志之外，还有大量的**论文集**出版。手册、指南、杂志特刊（Special Issues）、会议论文集、致敬文集（例如祝寿集）等都是这类文本的发表方式。同样由于篇幅限制，这里不对这一类别做深入讨论，仅仅提醒读者注意几个重要事项。首先，由于大部分这类文章并没有经过严格的匿名评议（主编当然会进行一定的挑选和把关）<sup>84</sup>，因此非期刊文章的质量就更为难以控制，但这并不代表文集论文天然就不如期刊论文。其次，重要学者

<sup>84</sup> 并非论文集或者类似的出版物就一定没有同行评议，不少北美的大学学术出版社仍有这一程序。但这一评审常常不再以双盲方式进行，此外评审标准也比期刊要弱。

的致敬文集，尤其相对年代较早的出版物，仍旧是重要文章的来源地之一。再者，学者的论文集（*kleine Schriften*）非常值得关注，因为通常只有比较重要的学者才有机会解集出版自己的作品，它们有时会收录一些不容易找到或者之前未发表的论文，而有时一些老论文会有增补、修改或者回应。最后，*Symposium Aristotelicum* 和 *Symposium Hellenisticum* 是亚里士多德和希腊化时期哲学的重要会议，之后成书发表的论文不少都成为相关领域的必读作品。但与之名称类似的 *Symposium Platonicum* 则文章质量乏善可称，其出版的论文大多属于可读可不读之间。

在论文和注释之外，古代哲学另一最为重要的研究文献的形态就是**专著**（*monography*）了。正如就论文而言，我们需要了解一些知名期刊，而在专著这里，我们需要了解一些知名的系列和知名出版社。正如每个出版社具有自己的特色和风格，尽管不少出版社都会出版古代哲学方面的研究，但以之为重点的却屈指可数。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一般在哲学上或者古典学上比较强的出版社，通常古代哲学也比较强大，但情况并不总是如此。例如 MIT Press 在当代哲学上十分强大，但古代哲学则基本属于空白；而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在古典学领域具有一定地位，但古代哲学则非常贫弱。与之不同，牛津大学出版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是在哲学、古典学以及古代哲学方面都有着大量的重要古代哲学出版的巨头；而在英语世界，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outledge, Bloomsbury 等出版社也有一定份量的古代哲学出版。英美世界之外，欧陆在古代哲学方面比较重要的出版社则包括荷兰的 Brill，德国的 De Gruyter 和 Vandenhoeck & Ruprecht，法国的 Les Belles Lettres，意大利的 Bibliopolis 等。不少影响力的古代哲学系列丛书也来自这些出版社，例如 *Oxford Aristotle Studies Series*, *Cambridge Studies in the Dialogues of Plato*, Brill 的 *Philosophia Antiqua*, De Gruyter 的 *Peripatoi* 等系列都出版过不少具有影响力的专著或论集。

## 5 尾声：几点建议

了解了背景和文献，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做古代哲学**，并且尽量去做合格的甚至是好的古代哲学。但与 know-that 不同，know-how 的问题远远不是一篇小文章，甚至不是任何操作手册，可以解决的。最后，让我们以几个简短的问答——它们涉及到古代哲学初学者常见的一些困惑——结束这篇概览。

**1. 古代哲学的研读者有必要成为经典的捍卫者或者好古主义者？** 对这一问题给出肯定回答的人通常没有很好地区分解释的善意原则（the principle of charity）和经典崇拜现象。前者指的是我们通常相信正在处理的文本或者哲学家大体是融贯和理性的，因此在没有其他明确相反证据的条件下，我们首先尽量对他们的说法或者论证给出文本许可的最强解释。但这并不意味着解释者总是认同或者试图捍卫他正在解释的文本或哲学家，更并不意味着大哲学家——柏拉图或者亚里士多德——从不犯错，或者只是故意犯错。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确比我们大多数人聪明，但这个事实无法形成任何有效的解释学原则。简而言之，古代哲学

既不是护教学，也不是经学。当然，基于理性的或者非理性的原因偏爱某个古代哲学家或者某个文本这一现象本身是可以理解的。

**2. 古代哲学没有前沿？**之所有会有这个问题，可能一些人认为哲学本身就没有前沿，从而古代哲学作为哲学的一部分自然没有前沿；而另一些人可能会把重心放在『古代』或者『经典』（classical）这一概念上；按照他们的推论，既然古代哲学是历史的或者经典的，那么谈论前沿就是概念上的自相矛盾。这些想法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我们很难在自然科学的意义上谈论哲学的进步，更不用说古代哲学的进步。同时，相比于自然科学，不仅古代哲学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包含历史维度，同时这一领域研究文献的更新——正如大部分人文科学——也不像自然科学那么迅速。一些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文献，就像前文提示的，仍旧有着迄今不可忽略的价值，值得阅读、参考和回应。然而，上述因素其实都不足以构成古代哲学没有前沿的理由。因为首先，在古代哲学领域，不仅不断有新发现的文献（特别是纸草和重写本），而且不少传统文献也在不断更新的整理和认识的过程之中。其次，学术共同体或者发现了新问题和新方法，或者对部分老问题有了新的解答。同时，其他学科和技术的发展（比如认知科学和数码人文等），也影响到古代哲学的发展，在这一基础上的跨学科研究是传统研究并没有涉及的。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仅仅将古代哲学视为单纯的经典解释既不准确，也不充分。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关注前沿不应该简化为仅仅关注最新的发表，更不代表研究需要总是追随热门话题。关心文献的进展仅仅是为研究创造某些有利条件，而能够独立寻找话题或判断热门话题的价值是优秀研究者的标志之一。鉴于这门学科的历史性与复杂性，有时复活或者重新回到一些被遗忘的传统讨论也可以创造前沿。

**3. 一手文献，还是二手文献重要？**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争议在学术共同体内部：有人可能倾向于强调一手文献的至高无上性，另一些人偏好炫耀把握最多或最新的二手文献。不过，在没有语境的前提下，单纯的强调前者或者后者似乎并无太多意义。因为正如上文对于史料和研究的考察已经暗示的，它们对于我们的阅读和研究在不同的意义上发挥着效用。一手文献重要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史料，是我们讨论的基础；而二手文献重要，不仅它们帮助我们理解前者；对于进阶的研究者而言，它们还甚至界定了我们的话题，是我们交流的对象。但仅仅关注前者，你往往成为一个孤独的好古者，不知道自己的盲点和误区；而过度关注后者，可能你难以提出原创性的话题，往往在他人已经划定的圈子内打转。换句话说，你最多成为现成话题的参与者，只能介入话题，但很难自己发现和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并且给出解答。这种张力就要求我们需要自己去寻求二者之间的平衡，无论是学习的时间分配之中，还是在实际的研究活动中。我们无法给出具体的比例来平衡二者，其原因在于其实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具体的研究主题与目的。因为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一个亚里士多德的研究者面对的二手文献通常是远远多于他的学生 Theophrastus 的研究者。

**4. 语言多多益善？**与当代哲学与其他具体科学相比，古代哲学的爱好者天然地容易亲近并且乐意投入学习语言。但经验的缺乏可能导致不少人陷入另一个极端，即过度的语言崇

拜,甚至以为语言掌握的多少就代表着研究的好坏。尽管,正如上文所提及的,语言学习对于古代哲学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掌握上文所提及所有语言,并不是成为合格甚至优秀研究者的必要条件,更不是充分条件。同时,从实用的角度,由于古代哲学需要掌握多方面的技能,而每门语言的掌握又需要投入相当的精力,古代哲学的爱好者就有必要平衡语言学习和其他技能学习的关系,不能因为前者而忽略后者。通常而言,古希腊语和英语往往是任何研习者进入这一领域的必要条件。但如果你的兴趣更在罗马哲学,那么拉丁语则也成为标配。这里需要注意,古代哲学的各个领域发展并不均衡一致,各个现当代语种的研究传统也会影响到你的语言选择。考虑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研究文献的浩瀚,仅仅阅读英语虽然会错过不少其他语种的重要研究,但在大部分情况不会对于你的研究造成实质影响。但如果你希望学习新柏拉图主义,那么德语,尤其法语,似乎就相当重要;而如果你立志钻研伊壁鸠鲁派的哲学家 Philodemus,那么意大利语就不可回避。

**5. 做欧陆的还是分析的古代哲学?** 正如在欧陆和分析的区分中误导性多于其积极价值,把这一类的范畴和对立放在古代哲学领域就更是如此了。一方面,在欧陆,紧密追随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风格的研究者越来越少;另一方面,正如前文提及的,靠近分析的古代哲学也大多走出了早期方法论和主题上的狭隘。很难说伽达默尔的弟子 Wolfgang Wieland 和 Theodor Ebert 在做欧陆风格的古代哲学,也很难说当代不少优秀的英美古代哲学研究者是严格“分析的”(比如 David Sedley 和 Charles Kahn)。尽管一般而言,来自柏林和巴黎的学者可能比普林斯顿和牛津的学者更愿意探讨历史语境和语文学,这并不妨碍他们的合作、竞争和理解。因此,尤其作为来自中国的研究者,固然每个人有自己的偏好和特长,但过早陷入这种对立似乎并没有太多益处。

十年前,著名的古希腊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研究专家 J. Barnes 认为随着古典学的衰落,古代哲学没有未来<sup>85</sup>。不过与他的看法相反,我对于未来的预期要乐观得多。这里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看到更多国家和文化的年轻人参与到广义的古代哲学的学习和研究之中;它在欧美主流国家阵地缩小的同时,也伴随着它在其他地区的拓展。我们并不能预测未来,但就古代哲学而言,至少汉语学界的学者和学生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拓展和深化它的研究,从而参与创造它的未来。当然,我们也需要保持警醒,这种参与应该时刻伴随着批判性的反思,既包括对于现在,也包括对于过去。这正因为此,相关的研究才足以成为**哲学**的一部分,并从而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 附录 2: 古希腊哲学历史简表

时期	哲学家与哲学文本	其他历史人物与事件
早期希腊哲学	Thales (约 624 – 546), Anaximander (约 610 – 546)	593 Solon 改革 540 Elea 建立

<sup>85</sup> Barnes, J. (2006). “Bagpipe music”, *Topoi*, 25 (1-2), 17–20.

	Anaximenes (盛年约 545, 卒于约 528)	561/0–556/5; 550/49;
	Pythagoras (约 570 – 490 BC)	540/39–528/7 Peisistratus
	Xenophanes (约 570 – 478)	的雅典统治
	Heraclitus (c. 535 – c. 475 BC)	521–486: 波斯王 Darius
	Parmenides (活跃于 5 世纪上半叶)	508/7: Cleisthenes 改革
	Empedocles (约 495–435 BC)	495–429: Pericles
	Zenon of Elea (约 490 – 430)	490–479 希波战争
	Anaxagoras (约 500/480 – 428)	478: Delian 同盟
	Diogenes of Apollonia: (盛年 460-430)	460–403: Critias
	Philolaus (约 470 – ca. 385 BC)	451/0–404/3: Alcibiades
		431–404 伯罗奔尼撒战争
智者运动与其 他思潮	Protagoras c. 490 – 420	
	Gorgias c. 485 – 380	
	Hippias 5 世纪	
	<i>Corpus Hippocraticum</i> (公元前 5 世纪-公元后 1- 2 世纪)	
	Derveni 纸草 (约 340 成文)	
经典时期希腊 哲学	Socrates (470/469 – 399)	411–410 四百人政体
	Democritus (c. 460 – c. 370)	404–403 三十僭主
	Antisthenes (445–365)	387/6 学园成立
	Archytas: (435-410 – 360-350 BC)	367–357: Dionysius II
	Plato (429? – 347 B.C.E.)	359–336: Philip II king of Macedon
	Aristippus (约 430–355)	
	Diogenes of Sinope (412/03–324/21)	
	Aristotle (384 – 322)	
希腊化时期哲 学	Theophrastus (372/70 – 288/86)	323 Alexander 去世
	Pyrrho (c. 365 - c. 275)	300 欧几里德的《几何原 理》
	Zeno of Citium 301 年创立斯多亚派	
	Epicurus 306 年创立伊壁鸠鲁派	295 Ptolemy 创立亚历山大 里亚的缪斯宫
	Chrysippus 232 继任斯多亚派掌门	
	Arcesilaus (316/5 – 241/0)	218 第一次 Punic War
	Carneades 167/66 继任学园掌门	148 Macedonia 称为罗马行 省
	Philon 110/09 继任学园掌门	
	Antiochus 79 (c. 125 – c. 68 BC) 离开“怀疑	40 Andronicus 出版亚里士

	<p>论的学园”，创建新学派，自称为“老学园”</p> <p>Cicero (106 – 43)</p> <p>Philodemus (110 -70 中期)</p>	<p>多德作品集</p> <p>31/0 BC 希腊化时期终结</p>
<p>罗马帝国与 晚期古代时期 哲学</p>	<p>Seneca (前 4 – 公元 65)</p> <p>Epictetus (c. 55 – 135 AD)</p> <p>Galen (129-200)</p> <p>176 Marcus Aurelius (121–180) 在雅典设立 四学派官方教席：柏拉图派、漫步派、斯多 亚派和伊壁鸠鲁派</p> <p>Sextus Empiricus (c. 160 – c. 210)</p> <p>Alexander of Aphrodisias (200 左右盛年)</p> <p>200 Diogenes Laertius 的《名哲言行录》成 书</p> <p>Plotinus 205-269</p> <p>Porphyry c. 234 – c. 305 AD</p> <p>Iamblichus c. AD 245 – c. 325</p> <p>306 Augustine (354–430 C.E.) 转信</p> <p>438 Proclus (c. 412–485 C.E.) 继任雅典柏拉 图学园掌门</p> <p>ca. 515 Damascius (c. 458 – after 538) 继任学 园掌门</p> <p>Simplicius (c. 470 – c. 560)</p>	<p>27 CE 罗马共和国终结， 罗马帝国时代开启</p> <p>161-180 Marcus Aurelius 的 统治</p> <p>313 米兰敕令</p> <p>380 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 国教</p> <p>410 Sack of Rome by Alaric</p> <p>476 西罗马帝国覆灭</p> <p>529 Justinian 关闭雅典学园</p>